

香港大埔碗窑再认识

郭学雷 (深圳博物馆)

学界对香港大埔碗窑的关注，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林仰山教授的调查¹。至 70 年代，蒋顺洪先生在考察窑址和走访村民的基础上，对碗窑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²。进入 80 年代，周月龄女士首次对碗窑试掘，并以所获标本、窑炉遗迹等材料，完成《略论香港大埔碗窑村的青花窑址》一文³。其后，魏天斐⁴、何翠媚⁵、林业强⁶、萧国健⁷等人也先后撰文，围绕大埔碗窑年代、分期、装饰等问题进行探讨，但因资料匮乏，无法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1995-1996 年⁸和 1999 年⁹，由区家发先生主持的碗窑调查、发掘，收获颇丰，为深入研究碗窑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新资料。围绕这些资料，周世荣、曾广亿、余家栋等人发表了一批新成果¹⁰。受区家发先生之邀，林业强先生以碗窑纪年史事和实物资料为依据，辅以碗窑出土遗物科学测试数据，对碗窑始烧年代等问题作了缜密考证¹¹。笔者亦曾于 1997 年大埔碗窑调查和研究成果发表之后，就该窑创烧年代作过探讨，主要认识和观点与林业强先生不谋而合¹²。近期又有幸受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之邀，对香港大埔碗窑历年来调查、发掘的遗物作进一步研究。故此，本文拟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科学发掘的大埔碗窑资料，并结合对香港、深圳、珠海、台湾和海外发现的

¹ 林业强《再说香港大埔碗窑四题》。见《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146 页，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 年。

² 蒋顺洪《香港大埔碗窑陶业浅探》，珠海书院文史研究所学会丛刊之二，1973 年。

³ 周月龄《略论香港大埔碗窑村的青花窑址》，未刊稿。

⁴ 魏天斐《香港最早青花瓷窑——大埔碗窑探源》，《七十年代》，1984 年 3 期。

⁵ 何翠媚 Printed Blue and White of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s.《贸易陶瓷研究》，NO.6,1986。105-130 页。

⁶ 林业强《大埔碗窑——香港的一处十九至二十世纪窑址》，《东亚艺术风格——亚洲美术考古论丛第十四号》，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University of London,1987。136-148 页。

⁷ 萧国健《香港新界大埔碗窑及其陶业之兴衰》，《香港考古学会会刊》，1993-97，156-160 页。

⁸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调查及研究》，香港区域市政局，1997 年。

⁹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 年。

¹⁰ 同注 8、9。

¹¹ 同注 1。

¹² 郭学雷《香港大埔碗窑始烧年代探析》，《南方文物》2000 年 4 期。

大埔碗窑瓷器及相关历史背景的考察，围绕大埔碗窑的创烧年代、历史背景、产品分期、工艺特点、窑业技术、生产方式、市场行销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 地层、遗物分析及各期遗存分布

1995-1996 年和 1999 年大埔碗窑的调查、发掘，以及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发表，无疑将碗窑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此前对碗窑始烧年代的争议并未因此得以解决，甚至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分歧，而且参与发掘的研究者的认识也不尽相同。究其原因，一方面，客观上是因当时参与发掘的研究人员所掌握的相关纪年、对比材料有限，故在对碗窑遗物年代的判断上，难免带有主观臆测的成份；另一方面，上述两批碗窑材料的研究报告，对科学发掘的地层、遗物的分析和对比研究尚嫌不足；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对闽粤东南沿海外向型青花瓷业，特别是大埔碗窑创烧的宏观历史背景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鉴于此，要解决碗窑始烧年代的争议，全面、准确地揭示大埔碗窑遗存的内涵，必须首先对大埔碗窑历年发掘的遗迹、典型地层及遗物作全面细致的考察。

（一）历年发掘探方分布情况

1995 年以来，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先后组织有关机构，对大埔碗窑进行过多次调查、发掘（图 1）。

1995-1996 年的发掘，主要集中在二区的龟地岗¹³。在龟地岗北侧一号窑附近发掘 3 个探方，编号 T7、T8、T9；在龟地岗南侧二号窑附近发掘 4 个探方，编号 T4、T5、T6、T10；在龟地岗西侧山坡上发掘 3 个探方，编号 T1、T2、T3。此外，在一区樊仙宫以西发掘 3 个探方，编号 T1、T2、T3。

1999 年的发掘也集中在龟地岗¹⁴。清理发掘了二号窑。在二号窑西南的坡地上发掘 4 个探方，编号 T3、T5、T6、T7；在龟地岗东侧发掘 1 个探方，编号 T4；在龟地岗西侧发掘 4 个探方，编号 T1、T2、T8、T9。此外，还在四区张屋地村前土岗丘上发掘 1 个探方，编号 A4T1。

2001 年配合上碗窑村丁屋建设工程，在位于淘洗池北偏西的小溪对岸发掘 2 个探方，编号 T1、T2¹⁵。发现捣炼池 2 个、储沙池 2 个。

2002 年配合张屋地污物处理装置工程，于张屋地村西北的后山发掘探方 1 条，编号 T3¹⁶。

2002 年配合大埔碗窑乡小型村屋建筑工程，对上碗窑土地编号 698A、698B 地段、马英伟屋地、马维康屋地、马少和屋地和下碗窑马劲辉屋地等六间丁屋地

¹³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调查及研究》，香港区域市政局，1997 年。8 页。

¹⁴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 年。8 页。

¹⁵ 《大埔上碗窑村丁屋建设工程考古抢救发掘工作报告》，2001 年。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¹⁶ 《大埔张屋地考古抢救发掘报告》，区家发文物考古顾问公司，2002 年 6 月。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进行发掘，共发掘 5 个探方，编号 T1 至 T5¹⁷。T1 位于龟地岗以东；T2 位于龟地岗以西偏北的碗窑四区；T3 位于下碗窑牛碾遗址正北；T4、T5 位于龟地岗西北方向约百余米处。

2004 年配合上碗窑村拟建小型屋宇工程，在碗窑山西南面坡脚处（南面紧邻一条小溪，东南方向是龟地岗），发掘 1 个探方，编号 TD22¹⁸。

2004 年为拟定碗窑保护规划，对大埔碗窑外围进行了较大范围的钻探，并试掘 4 个探方，编号 TP1 至 TP4¹⁹。TP1 位于龟地岗西侧山脚下；TP2 位于淘洗池以西的小溪对岸；TP3 距龟地岗东侧约 10 余米；TP4 距龟地岗西北方向约 60 米。

2010 年为重新评估龟地岗保留区范围，对龟地岗周边进行了系统钻探和试掘，发掘探方 12 个²⁰。编号 GGT1 至 GGT12。GGT1 至 GGT5 位于龟地岗西北；GGT8 至 GGT12 位于龟地岗东侧山脚下；GGT6、GGT7 位于龟地岗西南角坡脚。

（二）明代遗存

1. 地层及遗物分析

（1）95WYA2T5²¹。该探方所出“崇祯拾伍年造”青花碗残底（图 2）及刻“字孟程号泉……戊寅九月”铭残墓志（图 3），对碗窑遗存断代、分期有重要价值。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调查及研究》一书（下文简称 97 年报告）对以上两件纪年标本及相关地层关系重视不够，对与其伴出遗物的分析、排比和考证也明显不足，故造成对该探方出土诸多遗物年代的误判。

该方共分三层。

第三层：遗物较少，仅有“孝悌忠信”铭碗（图 4，中）、“正”字碟（图 6，右）。“孝悌忠信”铭碗，明显受明末流行的景德镇青花“状元及第”、“金榜题名”铭碗，及明末漳州诏安秀篆窑“□□传礼”铭碗等装饰的影响²²（图 5，右）。“正”字碟，原报告定为清代制品（图 6，右）。因类似的“正”字制品，福建漳州平和窑明晚至明末遗存中多有发现（图 6，左）²³，另考虑到该层之上发现了“崇祯拾伍年造”青花碗残底（图 2），故判定该层年代的下限当不晚于崇祯十五年，“正”字碟也就不可能是清代制品。至于该层年代之上限，参照景德镇青花“状元及第”、

¹⁷ 《大埔碗窑乡小型村屋建筑工程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报告》，区家发田野考古顾问公司，2002 年 2 月。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¹⁸ 《新界大埔碗窑村丈量约份 22 内小型屋宇 2004 年抢救发掘工作报告》，大地考古，2004 年 3 月。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¹⁹ Feasibility Study o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an Yiu Pottery Kiln Site Conservation Plan Report, June 2004.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²⁰ 《大埔碗窑遗址龟地岗保留区 2010 年考古调查工作报告初稿》，中港考古研究室，2010 年 4 月。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²¹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调查及研究》，香港区域市政局，1997 年。




以 95WYA2T5 为例，95 代表发掘年份，WY 代表上碗窑，A2 代表上碗窑二区，T5 代表 5 号探方。

²² 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 月。图版三八。

²³ 同注 22。图版九。

“金榜题名”文字装饰主要流行于万历后期至天启、崇祯年间的情况，当不早于万历后期。

第二层：遗物有“崇祯拾伍年造”青花碗残底（图 2）、蟠螭纹碗（图 14，中左）、“旭”字碟（97 年报告彩图 188）、菊花纹器盖（97 年报告彩图 167）、缠带纹碗（图 7，中）、白釉杯（97 年报告彩图 71）、蓝地白花花草纹碟（97 年报告彩图 171）等。其中缠带纹碗，明显受漳州秀篆窑（图 7，左）²⁴、彭水窑²⁵的影响（99WYA2T3L1 出土菊瓣纹碗亦是如此）。“旭”字碟，原报告定为清代制品，但据该层出土“崇祯拾伍年造”青花碗残底可以断定，该层形成的年代上限当不早于“崇祯拾伍年”，至于下限，从该层之上出土鹿纹碗与景德镇同类器物的比较来看，仍具显著的明末瓷器特点（图 8）。综合以上可知，该层应是典型崇祯时期遗存。

第一层：该层鹿纹碗之纹样，其母本显然来自嘉靖、万历以来的景德镇青花瓷同类装饰（图 8）。另值得注意的是，该鹿纹碗及该层伴出折枝花纹碗（97 年报告彩图 16）、“风”字碗（97 年报告插图 22）、锦带纹杯（97 年报告插图 28）、“尚”字碟（97 年报告彩图 85）、“寿”字碟（97 年报告彩图 187）、折枝花器盖（97 年报告彩图 168）等，其造型、工艺，及釉面灰白、温润失透、不够平整，青花发色灰暗等特征，均与其下层所出“崇祯拾伍年造”青花碗相同，故知上述青花瓷器的生产年代与“崇祯拾伍年造”青花残碗大致相当，相去不远。另须指出的是，该层所出“字孟程号泉……戊寅九月”铭残墓志（图 2），“戊寅”二字之上隐约可见“”残字。97 年报告中认为此残字是“天顺”的“顺”字的残留，并将该墓志作为碗窑创烧于明中叶的重要证据。对此，林业强先生和笔者均撰文提出质疑，认为“”残字应是“崇祯”二字中“祯”的残留。97 年碗窑报告将该墓志残字认定为天顺戊寅年，显然忽略了该墓志与科学发掘地层之间的关系。该墓志下层出有“崇祯拾伍年造”青花残碗（图 2），如该层年代为明中叶，显然与古遗址地层上晚下早的客观规律相违背。此外，与该层点彩撇口卧足杯（图 9，上右）、“寿”字碗（97 年报告定为清代制品，彩图 187）相类的器物，分别见于台湾台南社内遗址（图 9，下右）（该遗址主要遗存形成于荷兰人进占台湾南部的 1624 年之后）和澎湖马公港（该遗址主要遗存形成于荷兰人占领澎湖的 1622 年之后）²⁶；与该层团鹤纹碗类似的装饰则见于崇祯十六年 Hatcher 沉船中的景德镇制品（图 10）²⁷。参酌以上资料，可以断定该层同样为崇祯时期遗存。

（2）99WYA2T5。分两层，《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一书中（下文简称 2000 年报告）将这两层出土遗物定为明中期至清代产品，事实并非

²⁴ 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 月。图版四〇。

²⁵ 叶文程主编《中国福建古陶瓷标本大系——漳浦窑》，下，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 年 9 月。118 页。

²⁶ 卢泰康《台澎地区出土十七世纪漳州窑青花瓷》，《陈昌蔚纪念论文集》第四辑，财团法人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9 年。241 页，图 1-35。

²⁷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Phaidon-Christie's Limited 1998.P.67.

如此。

第二层：该层出土“孝悌忠信”铭碗（图 4，右）、“一色杏花香十里、状元归去马如飞”诗文碗（图 11，右）、山水柳树渔舟图碗（图 12，右）明显与明天启、崇祯间景德镇青花瓷器风格相近（图 11，左；12，左）。2001 年大埔上碗窑村丁屋建设工程 T2 第四层出土的山水渔舟图盘，也与明末景德镇窑和福建诏安秀篆窑²⁸同类制品如出一辙（图 13）。该层出土蟠螭纹碗与出土“崇祯拾伍年”铭青花残碗的 95WYA2T5L2 层中伴出的蟠螭纹碗完全一致，其图案母本应来自福建漳州华安东溪窑²⁹（图 14）。该层发现的锦带纹碗，则与崇祯十六年 Hatcher 沉船打捞的青花瓷碗同类装饰颇为相似³⁰（图 15）。综合以上可知，该层为天启、崇祯时期遗存。

第一层：与该层折枝花纹碗类似的产品，见于崇祯十六年 Hatcher 沉船打捞的景德镇青花瓷³¹（图 16）。该层的莱菔纹碗、莱菔纹碟明显模仿天启、崇祯年间景德镇青花同类装饰（图 17、18）。该层所出蟠螭纹器盖，与出土“崇祯拾伍年”铭青花残碗的 95WYA2T5L2 层中蟠螭纹碗绘画风格完全一致（图 14）。以上证据均表明，该层为崇祯时期遗存。

（3）99WYA2T6³²。耕土层下可分两层。

第二层：该层凤纹碗之凤纹简略草率，酷似崇祯十六年（1643）Hatcher 沉船³³、台湾明末澎湖马公港和台南社内遗址所出福建漳州窑制品³⁴，显然是以漳州窑同类产品为蓝本生产的（图 19、20）。该层所出婴戏图碗（图 21，右），绘画风格简约、率真，图样母本虽受景德镇的一定影响（图 22，左），但其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漳州诏安县秀篆窑（图 22，中）³⁵、广东大埔水尾窑³⁶。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澎湖凤櫃尾发现了大埔碗窑生产的此类婴戏图碗（图 21，左）³⁷，为研究大埔碗窑历史背景和行销市场提供了重要线索。与该层“魁”字碗类似的产品（图 23，左），在明晚至明末漳州诏安秀篆窑³⁸、明末台南社内遗址出土的福建漳州平和窑产品中也有发现³⁹（图 23，右）。该层之折枝花纹碗（图 16，中左，右），其折枝花的特点，与崇祯十六年 Hatcher 沉船中发现的景德镇青花碗的折枝花几近一致⁴⁰

²⁸ 曾凡《福建陶瓷考古概论》，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1 年 6 月。图版六五。

²⁹ 同 28。图版六七。

³⁰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图 12:22-12:26.

³¹ 同注 30。图 12:22-12:26。

³²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 年。

³³ 同注 30。图 12:27-12:30。

³⁴ 卢泰康《台澎地区出土十七世纪漳州窑青花瓷》，《陈昌蔚纪念论文集》第四辑，财团法人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9 年。240 页，图 1-30、31。

³⁵ 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 月。图版四五。

³⁶ 杨少祥《广东青花瓷器初探》，*Ancient Ceramic Kiln Technology in Asia*, edited by Ho Chuimei,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³⁷ 同注 34。236 页，图 1-22。

³⁸ 同注 28。

³⁹ 同注 35。图版九。

⁴⁰ 同注 30。图 12:22-12:26。

(图 16, 左)。该层所出的另一件折枝花鸟纹碗的图样也明显模仿自景德镇(图 24)。与该层出土类似的玉壶春瓶, 见于香港马鞍山乌溪沙居住遗址出土的碗窑产品⁴¹, 及台湾宜兰淇武兰遗址、台南社内遗址、日本九州大有府内町跡出土的漳州窑产品⁴²(图 25)。据卢泰康先生的研究, 在台湾, 这类玉壶春瓶不仅作为日常生活用器, 而且在个别地域族群中, 甚至视这些外来瓷货为珍贵的陪葬品, 而将其纳入丧葬礼仪性的习俗中⁴³。以上证据, 不仅表明该层为典型崇祯时期遗存, 而且, 让人明显感受到该层所出器物明显受了同期景德镇窑和漳州窑的双重影响, 不过更直接的影响来自漳州窑。

第一层: 该层文官碗的造型、胎釉、修足、青花发色与“崇祯拾伍年造”残碗完全一致, 同为崇祯时期产品。类似的文官碗见于南澳一号沉船打捞出的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⁴⁴, 也见于明末福建华安东溪窑产品⁴⁵及福建漳浦明崇祯十五年墓出土品(图 26)⁴⁶。该层的“寿”字碗(2000 年报告定为明早期制品)也显然受了明末景德镇青花的影响, 不过从漳州平和大垵窑发现的“寿”字碗来看⁴⁷, 大埔碗窑的此类装饰更直接的影响来自福建漳州(图 27)。值得注意的是, 该层还伴出了较晚的遗物, 如八卦太极图杯。此类器物在福建平潭康熙晚期碗礁一号沉船中的景德镇瓷器中有大量发现⁴⁸, 可知碗窑此类杯为康熙时期制品(图 42, 中右)。由此看来, 该层的堆积较为复杂, 包含了明末及康熙年间的遗存。

此外, 95WYA2T6 第三层出土的“元”字碗(外壁遗留两只小渔舟残痕。“元”字碗也见于福建漳州诏安县明晚至明末秀篆窑⁴⁹) (图 28); 99WYA2T3⁵⁰出土的天官图碗、垂柳纹碗、“魁”字碗、排点纹碗、锦带纹碗、蟠螭纹碗、莱菔纹碗、“寿”字碗、“一色杏花香十里、状元归去马如飞”诗文碗; 99WYA2T7⁵¹出土的天官图碗、“魁”字碗、“孝悌忠信”碗; 99WYA4T1 出土的“寿”字碗(2000 年报告图 40)、排点纹碗(2000 年报告图 43); 2001 年上碗窑村丁屋建设工程抢救发掘的 T2(第三、四层)出土的“寿”字碗、锦带纹“元”字碗⁵²; 2004WYA2TP2 第二层出土的“寿”字碗、蟠螭纹碗、“魁”字碗、“福”字碗、“元”字碗、“正”字碗、渔舟纹碗等⁵³均与 95WYA2T5、99WYA2T5、99WYA2T6 所见同类器物特征相同, 同属明末

⁴¹ 该资料由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

⁴² 卢泰康《台澎地区出土十七世纪漳州窑青花瓷》,《陈昌蔚纪念论文集》第四辑, 财团法人陈昌蔚文教基金会, 2009 年。242 页。

⁴³ 同注 42。243 页。

⁴⁴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澳 I 号明代沉船 2007 年调查与试掘》,《文物》2011 年 5 期。

⁴⁵ 曾凡《福建陶瓷考古概论》,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2001 年 6 月。图版六七。

⁴⁶ 王文逵《福建漳浦明墓出土的青花瓷器》,《江西文物》, 1990 年 4 期。

⁴⁷ 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报告之一》,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 月。图版四七。

⁴⁸ 《东海平潭碗礁一号出水瓷器》, 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4 月。198 页, 图 116。

⁴⁹ 同注 47。图版三八。

⁵⁰ 该层的资料多数没有发表, 现存于三栋屋博物馆。

⁵¹ 同注 50。

⁵² 《大埔上碗窑村丁屋建设工程考古抢救发掘工作报告》, 2001 年。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⁵³ Feasibility Study o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an Yiu Pottery Kiln Site Conservation Plan Report, June 2004.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遗存。特别是 99WYA2T7 第二层出土的一种蓝地白花边纹碗，也见于漳州平和南胜花仔楼窑址⁵⁴、五寨二垅窑、漳浦彭水窑⁵⁵明晚至明末遗存，在明末闽西粤东地区生产的青花瓷器中广为流行（图 29）。

2. 明代遗存分布（参见图 1）

碗窑明代遗存主要集中在龟地岗二号窑两侧下方坡地上。如 95WYA2T5、T6（第三层），99WYA2T3、T5、T6、T7 等前文确认的明代遗存，均集中在二号窑的西南下方山坡地带。二号窑东南侧虽未经发掘，但经 2010 年 8 月 27 日实地勘察所获标本来看，也是明代遗存集中之地。从二号窑两侧下方坡地明代遗存的分布特点来看，有可能是二号窑的窑业堆积。

四区的 99WYA4T1 位于龟地岗以西的张屋地村前土岗丘上，是龟地岗以西发现的唯一一处明代遗存。

2004 年配合碗窑保护规划发掘的 TP2，2001 年上碗窑村丁屋建设工程抢救发掘的 T2 第三、四层，也发现了明代遗存。两处地点分别位于淘洗池的西北、东北两侧，与淘洗池仅隔一条小溪，是龟地岗以北明代遗存的重要发现。

（三）清代遗存

1. 地层及遗物分析

（1）99WYA2T8⁵⁶。分两层。

第二层：本层发现的“大青年记”婴戏图碗，为该层遗存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图 30，右）。同出的“玉叶记”、“梧叶口”秋叶纹盘，也具典型清代瓷器特征（图 31，下左、下右）。首都博物馆藏景德镇青花“大清丁未年制”铭秋叶纹盘，（图 31，上左）⁵⁷；台南社内遗址所出“太平兴年 丙辰秋记”铭秋叶纹盘（图 31，上中）⁵⁸；约于 1690 年沉没于越南南部海域的 Vung Tau 号沉船发现的秋叶纹盘（图 31，上右）⁵⁹；台湾左营凤山旧城出土的“太平兴年 乙卯冬记”铭秋叶纹盘⁶⁰；广东大埔县水尾窑址出土的“太平年己未”、“太平年庚申”铭秋叶纹盘⁶¹等，为碗窑秋叶纹盘提供了重要断代依据。据谢明良、大桥康二、坂井隆先生的研究，以上干支年款的时代，均为康熙时期（分别为：丁未 1667、乙卯 1675、丙辰 1676、己未 1679、庚申 1680）。由此可知，大埔碗窑“玉叶记”秋叶图盘正是康熙时期景

⁵⁴ 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 月。图版六三。

⁵⁵ 叶文程主编《中国福建古陶瓷标本大系——漳浦窑》，下，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 年 9 月。144 页。

⁵⁶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 年。

⁵⁷ 《青花名瓷》，艺术图书公司（台北），1993 年。图 119。

⁵⁸ 卢泰康《台澎地区出土十七世纪漳州窑青花瓷》，《陈昌蔚纪念论文集》第四辑，财团法人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9 年。247 页，图 2-3。

⁵⁹ 阿部百里子《从越南 Vung Tau 沉船打捞出的中国陶瓷器》，《福建文博》1999 年增刊。

⁶⁰ 同注 58。

⁶¹ 大桥康二、坂井隆《インドネシア・バンテン遗迹出土の陶瓷器》，66 页。

德镇、福建等窑此类装饰流行风尚影响下的产物。此外，该层发现的婴戏图碗（图 32，中左）、太极八卦图碗（图 42，中左）、茅亭垂柳图碗（图 33，右），与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所见景德镇同类装饰瓷器风格颇为相近（图 32，左；图 33，左；图 42，左）⁶²。据笔者的考证，平潭碗礁一号为康熙晚期的一处沉船⁶³。综合以上情况，可知该层年代为康熙时期，下限不晚于康熙晚期。

第一层：与该层出土团菊纹碗类似的制品，见于雍正三年（1725）间的沉没于越南的金瓯（Ca Mau）沉船⁶⁴，据此推断该层的下限不晚于雍正时期（图 34）。

（2）99WYA2T9⁶⁵。分三层。

第三层：该层所见山水纹碗（图 35，右），与康熙晚期福建平潭碗礁一号出水同类制品（图 35，左）⁶⁶相近，只是风格略显粗放。该层出土一瓶盖上的婴戏纹，与前文断为康熙遗存的 99WYA2T8 二层所见婴戏纹如出一人之手，与碗礁一号瓷器上的婴戏纹亦如出一辙（图 32），故知该层应是康熙遗存。须指出的是，被余家栋先生推断为具有元代遗风、所谓明洪武、永乐年间烧造的芒口碟正出自该层⁶⁷。显然，与芒口碟伴出的康熙年间的遗物，无法为余先生的观点提供任何支持。不仅如此，香港东龙佛堂门炮台出土的芒口碟也为此类制品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佐证⁶⁸。据萧国健先生考证，佛堂门炮台大约创建于康熙五十八年至雍正二年⁶⁹，据此断定龙佛堂门炮台出土的芒口碟的上限不会早于康熙年间，当然，更不可能是洪武、永乐年间的遗物。

第二层：与该层出土的庭院婴戏图碗（图 32，右）、“寿”字碟（图 36，右）、山水纹碟（图 37，右）相近的制品，在福建平潭康熙晚期沉船打捞的景德镇瓷器中均可见到（图 32，左；图 36，左；图 37 左）⁷⁰，故知该层亦是康熙时期遗存。

第一层：该层的庭院婴戏图碗（见 2000 年报告图 12），与第二层康熙时期同类碗特征完全一致，表明两者为同期产品。但该层出土的灵芝纹碗（图 38，右），其生产年代稍晚。谢明良先生根据道光二年 Tek Sing 号（图 38，左；图 51，左）

⁶² 《东海平潭碗礁一号出水瓷器》，科学出版社，2006 年 4 月。194 页，图 112；202 页，图 121；198 页，图 116。

⁶³ 关于碗礁一号的沉没年代，栗建安先生认为是 17 世纪末，即康熙中期（参见《东海平潭碗礁一号出水瓷器》，科学出版社，2006 年 4 月）。但据笔者研究，碗礁一号沉没的年代，当为康熙末年。主要依据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青花山水人物图凤尾尊。该尊腹部楷书“信士生员和德威喜助清溪古洞神前花瓶一枝，祈保合家清泰，康熙乙未仲夏吉立”。“康熙乙未”即康熙五十四年（参见陈润民主编《清顺治康熙朝青花瓷》，图 311，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 1 月）。值得注意的是，该尊与平潭碗礁一号出水的两件青花人物故事图凤尾尊从造型、纹饰，到青花发色等可谓如出一辙（参见《东海平潭碗礁一号出水瓷器》，图 34、37）。

⁶⁴ Nguyen Dinh Chien 《The Ca Mau Shipwreck》，Ha Noi 2002. SOTHEBY'S PREVIEW:MADE IN IMPERIAL CHINA (29.02.07):76,000 pieces of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rom the Ca Mau shipwreck. 卢泰康《台湾地区出土十七世纪漳州窑青花瓷》，《陈昌蔚纪念论文集》第四辑，财团法人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9 年。251 页，图 2-20。

⁶⁵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 年。。

⁶⁶ 同注 62。183 页，图 99。

⁶⁷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 年。104 页。

⁶⁸ TUNG LUNG FORT, A Ch'ing Dynasty Fortification on Tung Lung Island, Hong Kong, PAMELA RUMBALL ROGERS,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Occasional Paper No.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⁶⁹ 萧国健《清代香港之海防与古垒》，显朝书室出版，1982 年。

⁷⁰ 同注 62。194 页，图 112；208 页，图 126；182 页，图 99。

⁷¹、嘉庆二十二年 Diana Cargo 发现的灵芝纹盘，以及江西出土“乾隆乙卯年”铭灵芝纹盘，推测灵芝纹碗、盘的流行年代可能是在乾隆至道光之间，即十八世纪中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⁷²。不过，从景德镇御器厂出土资料来看，明代宣德官窑瓷器中已有这类装饰⁷³。雍正官窑青花还见有仿宣德官窑此类装饰的制品（图 39）。耿宝昌先生著《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⁷⁴，介绍雍正年间流行的一种方块款盘碗瓷器上，也常见到灵芝纹装饰。综合以上，该层的年代应在康熙、雍正之际。

（3）99WYA2T1、T2⁷⁵。99WYA2T1 第二层出土莲花纹碟（图 43，右。2000 年报告定为明代制品，但 99WYA2T8 二层出土的另一相同制品却被定为清代制品，图 43，左）、蓝地白花菊花纹碗（图 45，左。2000 年报告定为明代制品，但 99WYA2T8 二层中出土的相同制品却定为清代制品，图 45，右）、99WYA2T2 第二层出土的蓝地白花菊花纹碗（图 44）、团鹤纹碗（图 46，左。2000 年报告误定为明代制品）、太极八卦纹碗（图 42，右）、诗文碗（图 48，左），第一层出土的钵形匣钵（2000 年报告图 158）等，在前文认定为康熙时期的 99WYA2T8 二层中均可见到，可知 99WYA2T1、T2 同是康熙时期的遗存。

（4）95WYA2T1、T2、T3、T4、T6L2、T9⁷⁶。

95WYA2T1 第五层出土的四系壶残片（97 年报告图 44，康熙五十八年至雍正二年间修建的东龙佛堂门炮台遗址也出土了此式壶）；第三层出土的山水纹碗（图 61，与 99WYA2T9 第二、三层山水碗相同，图 59，左）、模印“酒”字铭盘残片（97 年报告彩图 37，与 99WYA2T8 第二层模印“口”铭菊花纹盘相同，2000 年报告彩图 109）；第二层出土的八卦太极纹碗（97 年报告彩图 51，见于 99WYA2T8 二层，图 42，中左）、山水纹碗（图 35，中，与 99WYA2T9 第三层山水纹碗相同，图 35，右）；第一层出土“味”字蝶（97 年报告彩图 89，与 99WYA2T8 二层出土“万”字蝶如出一辙，2000 年报告彩图 119）、烟头模具（97 年报告彩图 237，与 99WYA2T9 二层出土烟斗相同，2000 年报告图 152）、梵文碗（图 53，右。明显仿自景德镇雍正以来流行的同类装饰，图 53，左）。

95WYA2T2 第三层出土烟斗头（97 年报告彩图 191，与 99WYA2T9 二层出土烟斗头特点相同，2000 年报告图 152）；第二层出土点彩纹碗（97 年报告图 75，与 99WYA2T9 二层、99WYA2T8 二层出土点彩碗相同，2000 年报告图 98）。

95WYA2T3 第三层出土梅花纹碟（97 年报告彩图 92、93，与 99WYA2T8 二层出土松竹梅碗所绘梅花，一层出土梅花纹器盖所绘梅花相同，2000 年报告彩图 54、93）；第二层出土点彩纹碟（97 年报告彩图 184，与 99WYA2T8 二层出土点彩纹碟相同，2000 年报告图 122）。

⁷¹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2000.11.17.110~116 页。

⁷² 谢明良《对于嘉义县新港乡板头村遗址出土陶瓷年代的一点意见》，《台湾史研究》9 卷 2 期，2002 年。

⁷³ 《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1998 年。图 13。

⁷⁴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1993 年。

⁷⁵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 年。

⁷⁶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调查及研究》，香港区域市政局，1997 年。

95WYA2T4 第二层出土的青花梅竹纹小杯（97 年报告图 101，造型与 99WYA2T8 第一、二层出土小杯相同，2000 年报告彩图 99，口沿施酱釉也为康熙时期特点）；第一层出土菊花纹碗（与 99WYA2T8L1 出土相同，图 34）。

95WYA2T6L2 出土“福禄”字碗（97 年报告图 59，与 99WYA2T8 二层出土梅兰竹石文碗内底所书“福禄”字特征完全一致，2000 年报告彩图 93b）。

95WYA2T9 第二层出土竹梅纹碗、杯（97 年报告图 92、彩图 162，与 99WYA2T8 二层出土竹梅纹碗、杯相同，2000 年报告彩图 93a、99）、兰草纹碗（97 年报告彩图 131，与 99WYA2T8 二层出土兰草纹碗同，2000 年报告图 85）、草叶纹碟（97 年报告图 108，与 99WYA2T8 二层出土草叶纹碟同，2000 年报告图 134）；第一层出土梅花纹盘（97 年报告图 105，与 99WYA2T8 一层出土梅蝶纹盘相同，2000 年报告彩图 110）。

以上证据均表明，95WYA2 T1、T2、T3、T4、T6L2、T9 出土瓷器，与前文确认为康熙至雍正遗存的 99WYA2T8、T9 出土瓷器特征完全相同，同属康熙、雍正间的遗存。

（5）2001WYA2T2⁷⁷。

2001 年，配合上碗窑村丁屋建设工程进行了抢救发掘，探方编号 T2。原报告认为该遗存主要是明代的，清初可能还在使用，但清初的遗物不多见，清中叶以后则完全不见。事实上，除第四层为单一明代堆积外，第三层开始为明代与清代遗物的混合堆积层。如该层的锦带纹碗（原报告图号 T2L3:22）、柳树纹碗（原报告图号 T2L3:18）与前文确认为明代遗存的 99WYA2T5L2、99WYA2T6L2 所出锦带纹碗（2000 年报告图 10）、柳树纹碗（2000 年报告彩图 9）完全相同；而该层同出的点彩纹碗（原报告图号 T2L3:21）、菊花纹碗（原报告图号 T2L3:20）见于前文确认为清康熙、雍正遗存的 99WYA2T8L1、L2，可知该层遗存形成的年代在康熙、雍正之际。第一层为扰乱层，第二层出土粗放的菊花纹碗、点彩纹碗，面貌与前文确认为康熙、雍正之际的 99WYA2T9 所出同类装饰器物特征相同。以上证据表明，该遗存第二、三层大致形成的年代在康熙、雍正年间。

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存单位还发现储沙池和捣炼池各两个。储沙池和捣炼池内发现的文物与地层中的文物不同，而从发掘报告介绍的情况来看，第二层已见到储沙池和捣炼池露头，说明储沙池和捣炼池是在打破第二层基础上修建的，也就是说储沙池和捣炼池晚于第二层的下限雍正。而且从储沙池和捣炼池出土的灵芝纹碗、川字纹碗来看，其年代上限也不早于雍正。

（6）2002WYA2T3⁷⁸。

2002 年，配合张屋地污物处理装置工程进行了抢救发掘，探方编号 T3。该遗存发现大量川字纹瓷器，被发掘者认为可能是大埔碗窑最早生产瓷器的地方。事

⁷⁷ 《大埔上碗窑村丁屋建设工程考古抢救发掘工作报告》，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⁷⁸ 《大埔张屋地考古抢救发掘报告》，区家发文物考古顾问公司，2002 年 6 月。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实上，川字纹瓷器的年代要晚的多。川字纹碗在东龙佛堂门有大量出土，九龙寨还有少量发现（图 62）。佛堂门炮台雍正二年以后才修建完毕，废弃于嘉庆十五年。九龙寨嘉庆十五年后投入使用。据此推测川字纹产品的流行的年代在嘉庆前后。

（7）2004WYA2TD22⁷⁹。

2004 年配合上碗窑村拟建小型屋宇工程进行了抢救发掘，探方编号 TD22；该遗存遗物丰富，第六层被发掘者暂定为明代遗存。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该遗存第六层出土的山水纹碗、四系执壶，见于前文认定的康熙时期遗存 99WYA2T9 第二层。第三层出土的太极图纹杯，见于前文认定为康熙遗存的 99WYA2T2 第二层，第三层出土菊花纹碗，见于前文认定为康熙、雍正之际的 99WYA2T9 第一层。综合以上，可知 TD22 应是一处康熙、雍正时期的遗存。

（8）2004WYA2TP1、TP3⁸⁰。

2004 年为拟定碗窑保护规划，对大埔碗窑外围试掘的 TP1、TP3。TP1 发现残片数量不多，残片很小，无法进行比对，但可以肯定为清代遗存。TP3 发现的残片也不大，可以看出有四系壶、菊花纹碗、山水纹碗，与 99WYA2T9 第二层遗存面貌一致，同样为康熙时期遗存。

（9）2010WYA2GGT1、GGT2、GGT3、GGT4、GGT12⁸¹。

2010 年为重新评估龟地岗保留区范围，对龟地岗周边进行试掘的 GGT1、GGT2、GGT3、GGT4、GGT12；

GGT1：该方位于 2004 年中港考古研究室为拟建小型屋宇工程进行抢救发掘的 TD22 西北角，是此次发掘出土遗物最丰富的遗存单位。第一、二层为现代扰乱层。第三层出少量青花，无法做细致比对研究。第四层出土的白釉灯、白釉芒口盏、烟斗头、菊花纹碗、梅花纹碗、草叶纹四系壶、草叶纹杯、菊花“福”字大盘；第五层出土的草叶纹碗、草叶纹杯、梅花纹碗、山水纹碗、菊花纹碗、四系壶、卷草纹盘、烟斗头模、宽弦纹盘；第六层出土的梅花纹杯、草叶纹灯、菊花纹杯等与 99WYA2T9、2004WYA2TD22 遗存面貌雷同，为康熙、雍正时期的遗存。

GGT2：该遗存单位第四层出土大量青花瓷，但报告中没有提及具体情况。从报告中仅披露的第三层出土草叶纹盘、第六层出土山水纹碗分别与 99WYA2T9 第一层、第三层同类装饰器物相似，为康熙、雍正时期的遗存。

GGT3：第二层出土山水纹碗、菊花纹碗与 99WYA2T9 第二、三层面貌相近。

GGT4：第六层出土灵芝纹碗，第五层出土川字纹碗、灵芝纹碗，与 2001WYA2T2 发现的储沙池和捣炼池中出土的灵芝纹碗、川字纹碗完全相同。两个遗存单位距

⁷⁹ 《新界大埔碗窑村丈量约份 22 内小型屋宇 2004 年抢救发掘工作报告》，大地考古，2004 年 3 月。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⁸⁰ Feasibility Study o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an Yiu Pottery Kiln Site Conservation Plan Report, June 2004.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⁸¹ 《大埔碗窑遗址龟地岗保留区 2010 年考古调查工作报告初稿》，中港考古研究室，2010 年 4 月。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离上非常接近，应是一处关系密切的遗存。与 GGT4 邻近的龟地岗北面山脚下的 95WYA2T8 第二层也出土了川字纹碗，该方紧邻一号窑炉，川字纹瓷器是否与一号窑有关，值得关注。

GGT12：第一层出土过墙龙碗、花口灯、“福”字碗。其中的过墙龙碗，从景德镇同类装饰来看，上限也不会早于雍正。

(10) 95WYA1T1、T2、T3⁸²。

这三个探方位于一区，是清代中期以后遗存所在，窑业堆积颇丰，瓷片、窑具俯拾皆是。

95WYA1T1。分十三层（十二、十三层原报告中未提及）。

第十一层：该层出有重圈纹碗、点彩碗。原报告认为重圈纹碗是晚清至民国制品（图 49，左）。相同的重圈纹碗在香港东龙佛堂门炮台遗址也有发现（图 49，右）。前文提到佛堂门炮台大约创建于康熙五十八年至雍正二年间，废弃于嘉庆十五年。由此可知，重圈纹碗的年代可限定在雍正至嘉庆年间。

第五至十层：这几层出土的文物特征非常相近。如第六、七、十层均出土了戳印菊花纹碗。第五、六、八、十层均出土了灵芝纹装饰的碗或盘类器物（图 38，中；图 51，右）。其中发现较多的灵芝纹碗，据前文的考察，主要流行于雍正至道光年间。第六层的过墙龙碗（图 56），从景德镇“大清雍正年制”款的同类装饰来看（图 58），其上限当不会早于雍正。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层出土的花蝶纹碗（97 年报告图 77），第七层出土的川字纹碗（图 62，左上）、山水纹碗，在东龙佛堂门炮台遗址也有发现。

综合以上情况，推断 95WYA1T1 遗存的年代约在雍正至嘉庆年间。

此外，95WYA1T2 第六层出土地菊花纹碗（图 34，下左），见于雍正年间的越南 Ca Mau 沉船打捞品（图 34，上左）。另 95WYA1T2 第四层出土的灵芝纹碗、95WYA1T3 第一层出土的过墙龙盘均与 95WYA1T1 发现的同类器物特征相同。由此可知，95WYA1T2、95WYA1T3 与 95WYA1T1 同属雍正至嘉庆时期遗存。

2. 清代遗存分布（参见图 1）：

上碗窑二区的龟地岗是清代康熙至雍正时期遗存最集中的区域。除紧邻二号窑两侧下方山坡是明代遗存外，龟地岗其余部分均可见到清代遗存堆积。95WYA2T1、T2、T3、T4、T6L2、T8、T9，99WYA2T1、T2、T8、T9，2004 年为拟定碗窑保护规划，试掘的 TP1，均属龟地岗范围内的清代遗存。

淘洗池小溪的两岸，也是上碗窑二区清代遗存较为丰富的区域。2001 年上碗窑村丁屋建设工程抢救发掘的 T2（第一、二层）；2004 年配合上碗窑村拟建小屋宇工程的考古调查与抢救发掘的 TD22；2010 年为重新评估龟地岗保留区范围，对龟地岗周边进行试掘的 GGT1、GGT2、GGT3、GGT4，均分布在淘洗池小溪的两岸。

⁸²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调查及研究》，香港区域市政局，1997 年。

龟地岗以东也发现少量清代遗存, 2004 年为拟定碗窑保护规划, 对大埔碗窑外围试掘的 TP3; 2010 年为重新评估龟地岗保留区范围, 对龟地岗周边进行试掘的 GGT9、GGT12 均在此范围内, 因发现遗物较少, 该区域可能已处在窑场的边缘。

2002 年配合张屋地污物处理装置工程抢救发掘的 T3⁸³, 地点位于张屋地村西北的后山, 是较为偏远的一处清代遗存。

一区是清雍正以后遗存所在, 特别是铁丝网范围之内, 窑业堆积颇丰, 瓷片、窑具俯拾皆是。95WYA1T1、T2、T3 正好位于此区域, 可反映该区遗存的基本特点。

二 创烧年代及历史背景

关于大埔碗窑的创烧年代, 众说纷纭, 有明初⁸⁴、明早⁸⁵、明中⁸⁶、明后⁸⁷、明末⁸⁸等观点。那么, 碗窑究竟创烧于何时? 除借助前文对碗窑科学发掘资料与纪年器物等相关材料的对比研究之外, 还需结合对相关历史背景的考察才能找到准确答案。

先看明初、明早的观点。

明初之说, 最早是蒋顺洪先生通过走访碗窑马世安所作的推测, 并无任何可靠证据支持⁸⁹。余家栋先生承袭该观点, 并明确指出碗窑创烧于洪武、永乐年间。其主要依据是 1999 年碗窑发掘的一批青白釉碗、碟、唇口碟、芒口碟和圆砚(见 2000 年报告彩图 63-70)⁹⁰。余先生认为, 上述青白釉瓷器不少采用垫墩明火叠烧, 内底露胎或刮一道涩圈, 外壁施釉不到底, 有的底腹交接处有一道不规则的旋削面, 底足内墙离心斜削, 足沿呈“鲫鱼背”状, 与景德镇洪武青白瓷多相近似。但余先生并未举出碗窑青白釉器物与景德镇洪武青白瓷对比的实证。事实上, 余先生举证的白釉芒口釉盏, 出自典型的清代地层⁹¹, 用其作为“明初说”的依据显然是不足为凭的。不仅如此, 林业强先生早已指出所谓覆烧青白釉小碟, 其实与

⁸³ 《大埔张屋地考古抢救发掘报告》, 区家发文物考古顾问公司, 2002 年 6 月。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⁸⁴ 蒋顺洪《香港大埔碗窑陶业浅探》, 珠海书院文学历史研究所丛刊之二, 1973 年。

余家栋《香港大埔碗窑试析》, 见《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000 年。103 页。

⁸⁵ 周世荣《海滨瓷都——再谈香港大埔碗窑的青花瓷》, 见《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000 年。94 页。

⁸⁶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调查及研究》, 香港区域市政局, 1997 年。

⁸⁷ 周月龄《香港大埔碗窑村的青花窑址》, 未刊稿。

⁸⁸ 林业强《再说香港大埔碗窑四题》, 见《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000 年。146 页。

郭学雷《香港大埔碗窑始烧年代探析》, 《南方文物》2000 年 4 期。

⁸⁹ 蒋顺洪《香港大埔碗窑陶业浅探》, 珠海书院文学历史研究所丛刊之二, 1973 年。

⁹⁰ 余家栋《香港大埔碗窑试析》, 见《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000 年。103 页。

⁹¹ 该盏出自 99WYA2T9L3 层。该层出土的梅兰花蝶纹杯, 与 99WYA2T8L2 所出梅兰花蝶纹杯完全相同, 该层出土的其他瓷器也与 99WYA2T8L2 所出基本一致(该层因出土一件“大清年造”款瓷器可确认为清代地层), 据此可知 99WYA2T9L3 亦为典型的清代遗存。

景德镇南宋至元代青白瓷的覆烧毫无关系。碗窑的这类口沿无釉的小碟其实是灯盏碟，为了防止灯芯在燃点时下滑，有必要“芒口”⁹²。

明早说是周世荣先生提出的。其依据是 99WYA2T5（报告中误称为六号探方）出土的青白瓷（部分内壁白釉，外壁黑蓝釉）撇口卧足杯（图 9，上左）。周世荣参照《深圳市唐至明清墓葬调查发掘简报》定为宣德以前的“Ⅰ式杯”⁹³，认为大埔碗窑青花瓷的始烧年代至少可以早于明宣德。事实上，深圳白釉撇口卧足杯年代被定为宣德以前，依据是深圳南头西郊采集的一件景德镇生产“宣德年造”款红绿彩鱼纹卧足杯（图 41）⁹⁴。而据笔者对实物的观察，该卧足杯的“宣德年造”是典型的伪托款，其真实的生产年代是明代中期。从碗窑窑址与白釉撇口卧足杯伴出的莱菔纹碗、盘（图 17、18），蟠螭纹盘、器盖来看（图 14、40），明显与明天启、崇祯时期景德镇瓷器的装饰特点相同。而且碗窑出土的青花撇口卧足杯，本身亦带有显著的晚明特色（图 9）。如在台湾台南社遗址明末遗存中发现了此类青花撇口卧足杯（图 9，下右）⁹⁵，为此类卧足杯的断代提供了重要参照。明早说的依据之二是认为 99WYA2T6 下层瓷器具有较多的明代空白期特征。事实上，据笔者对 99WYA2T6 下层器物的观察，均为典型明末遗存。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之一，是该层出土了明显仿烧明末景德镇瓷器的莱菔纹碗（图 17）；依据之二，是该层出土的水禽纹碗与明末景德镇同类装饰如出一辙（图 50）。

明初、明早观点的提出，还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社会背景。众所周知，明立国之初，明廷便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当然这只是对私舶而言，明前期官方的海上贡舶贸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朱元璋在位期间，有关海禁的诏令每过一二年就重申一遍⁹⁶。从这些禁令中可以看出，两广地区作为对外贸易的前沿受到严格管制。永乐间，“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⁹⁷。由于平头船无法进行远洋航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断绝了民间船只远洋航行的可能性。宣德八年以后，由于朝贡贸易日渐衰落，加之塞防吃紧、海禁政策稍有松弛，民间走私海外贸易才有所抬头。而且，早有学者指出，闽粤沿海出现的大批仿烧景德镇青花瓷的窑场，其实正是明代中期以来华瓷风靡海外，海外对中国青花瓷需求激增，给东南沿海

⁹² 林业强《再说香港大埔碗窑四题》，见《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153页。

⁹³ 《深圳市唐至明清墓葬调查发掘简报》，见深圳博物馆编《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6月。137~138页。

⁹⁴ 杨耀林《深圳出土瓷器及有关问题的探讨》，见深圳博物馆编《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6月。249页。

⁹⁵ 卢泰康《台澎地区出土十七世纪漳州窑青花瓷》，《陈昌蔚纪念论文集》第四辑，财团法人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9年。241页，图1-35。

⁹⁶ 洪武四年十二月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太祖实录》卷七零）。洪武十四年十月又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上以中国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明太祖实录》卷二零五）。洪武二十七年，由于沿海走私活动频繁，朱元璋又下令：“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三十年，他再次“禁中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

⁹⁷ 《明太宗实录》卷二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

青花瓷器带来了更广阔市场背景下的产物⁹⁸。由此看来,在明中期以前,碗窑根本没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

接下来看明中期说。该说是在1997年出版的《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调查及研究》一书中提出来的。对该说提出的六点理据,笔者在2000年发表的《香港大埔碗窑始烧年代探析》一文中已逐一作了辨析,在此不再赘言⁹⁹。

再来看明后期说。该说是周月龄女士提出的¹⁰⁰。周女士以康熙二十七年版的《新安县志》是从康熙九年编撰为依据,指出《新安县志》所载“碗寮村”地名是沿用了康熙以前的老地名。并进一步提出碗寮村从设窑烧造瓷器,到确定地名,绝非一朝一夕,应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从地名看,碗窑的历史可上溯至明代后期。周月龄女士的判断大致不错,只是明后期的概念太过宽泛。

最后,来看明末的观点。萧国健、林业强和笔者均持此看法。萧国建先生还进一步把文、谢二氏具体迁入并创建窑场的时间限定在万历年间¹⁰¹,但并未提供任何相关证据,仅是一种推测而已。

从前文对大埔碗窑早期遗物的考察结果来看,碗窑创烧的上限不早于万历后期,下限则不晚于崇祯十一年。这是相对保守的判断,是否可进一步缩小范围,得出更为接近客观事实的结论呢?如果将碗窑放入当时东南沿海大的历史背景下作一考察,便不难发现,碗窑极有可能是崇祯年间创烧的一处窑场。理据如下:

其一,大埔碗窑所有明代遗存最下层的瓷器,均与出土“崇祯十五年”铭残碗的95WYA2T5L2所出瓷器特征一致,表明它们大致应是同一时期的产品。

其二,2010年7月,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对深圳大鹏所城城隍庙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大埔碗窑瓷器,有莱菔纹碗、蟠螭纹碗、柳树纹碗、草叶纹碗等。这批瓷器明显与碗窑出土“崇祯十五年”铭残碗的95WYA2T5L2所出瓷器特征完全相同。特别是大鹏出土的这批碗窑瓷器与崇祯通宝伴出,为其年代的断定提供了又一重要佐证¹⁰²。

其三,大埔碗窑的创烧极有可能是崇祯年间中荷瓷器贸易急剧扩张的结果。17世纪初,碗窑所处的东南沿海正经历着一场海外贸易的变革——中荷瓷器贸易起步。崇祯之前,中荷瓷器贸易还处在初始阶段,瓷器交易量不大。1624年,荷兰人占领台湾岛,在岛上建立热兰遮城,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口岸购买瓷器,同时大批中国商人将瓷器运到热兰遮卖给荷兰人,热兰遮成为瓷器贸易中心。至崇祯八年(1635),荷兰东印度公司得到瓷器购买权,更加速了瓷器贸易的发展,瓷器交易量开始急剧增长。这一年,东印度公司运回荷兰的瓷器数量首次突破10万,达到221579件¹⁰³。崇祯十二年(1638),在“荷兰号”等荷兰商船满载瓷器驶

⁹⁸ 吴春明著《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江西高校出版社。338-341页。

⁹⁹ 郭学雷《香港大埔碗窑始烧年代探析》,《南方文物》2000年4期。

¹⁰⁰ 周月龄《略论香港大埔碗窑村的青花窑址》,未刊稿。

¹⁰¹ 萧国健《香港新界大埔碗窑及其陶业之兴衰》,《香港考古学会会刊》,1993-97。156-160页。

¹⁰² 承蒙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吉笃学先生安排,对大鹏发掘出土的大埔碗窑瓷器及相关资料进行了观摩。

¹⁰³ Michel Beurdeley, *Porcelia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1962. p.9.

离台湾之后，台湾荷兰商馆库存的瓷器仍达 890328 件。而且此后数年，中荷贸易继续维持在这一水平上¹⁰⁴。瓷器贸易的急剧扩张，使景德镇和福建沿海原有的瓷业生产，无法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促使窑业主在沿海地区寻求新的瓷业生产基地。

其四，大埔碗窑的创烧，是中荷瓷器贸易大发展导致的瓷业市场进一步分化的结果。崇祯年间中荷瓷器贸易的大发展，使瓷业市场根据不同的需求进一步分化。据卢泰康先生的研究，从 1626 至 1654 年间，在荷兰人运至巴达维亚的中国瓷器中，大部分属于精细的景德镇瓷器，是要运回荷兰本国及欧洲其它市场。剩下的瓷货中有不少福建漳州窑粗瓷，则用于南亚各岛屿的“岛间贸易”，或者是亚洲境内各港埠的“港脚贸易”¹⁰⁵。据笔者的观察，作为中荷贸易重要转口港的台湾澎湖、台南热兰遮城发现的所谓漳州窑瓷器中，显然包含了一些来自香港大埔碗窑的“粗瓷”，也就是说，香港大埔碗窑瓷器极有可能作为“岛间贸易”或“港脚贸易”的商品被纳入了中荷瓷器贸易的营销网络。

其五，万历以来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剧增，加之当地丰富的瓷土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大埔碗窑创烧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力物质基础。除了中荷贸易的因素之外，万历以来珠三角的市镇迅速发展也是促使大埔碗窑创烧的一个重要原因。永乐时珠三角的市镇仅 33 个，嘉靖 37 年增至 95 个，万历 30 年发展到 176 个，占全省市镇的 40%¹⁰⁶。珠三角市镇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珠三角地区经济的繁荣，香港当然也不例外。市镇的发展，必然带来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剧增，对瓷器的需求也随之扩大，而中荷瓷器贸易数量的急剧增加，景德镇包括福建等地的窑场满足不了国内外迅速增长的需求，而此时大埔碗窑所处地理位置靠近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必经之路，经济繁荣、劳动力富足，加之丰富的瓷土资源，故而在中荷瓷器贸易和当地瓷业需求的双重刺激之下应运而生。

三 产品分期、窑业技术、生产方式及行销市场

（一）产品分期

根据出土遗物、地层关系，及相关遗址、墓葬和纪年材料，并结合历史背景，可将大埔碗窑分四期。

1. 初创期（明崇祯至清初）

通过前文对大埔碗窑典型地层中早期遗物及相关历史背景的考察，将崇祯作为大埔碗窑创烧年代的上限，当无大谬。至于其下限，因明朝灭亡，战火从中国北方蔓延到盛产瓷器的南方，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瓷器生产和销售，景德镇遭到

¹⁰⁴ 钱江《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与荷兰的瓷器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89 年 1 期。

¹⁰⁵ 卢泰康《台澎地区出土十七世纪漳州窑青花瓷》，《陈昌蔚纪念论文集》第四辑，财团法人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9 年。

¹⁰⁶ 《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一）第 97 页。

严重破坏。中国瓷器货源不足、销售停滞，瓷业生产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1645年以后，中国瓷器出口减少了2/3以上¹⁰⁷，闽粤沿海贸易大大萎缩，加之清初禁海、迁海令的颁布，大埔碗窑应在入清后不久便停烧了。

该期典型遗存有：95WYA2T5L1、L2、L3；99WYA2T5L1、L2；99WYA2T6 L1、L2。烧造品种以青花瓷为大宗，兼烧少量白釉、蓝釉瓷器。瓷器胎质多呈灰白，不够致密。釉面青灰肥润呈乳浊状，不够平整。青花呈色多呈灰蓝或灰黑色。

常见典型器型有撇口碗（图12，中）、直口碗（图4，右）、斜腹浅碗（图14，中左、中右）、卧足杯（图9）、撇口杯（2000年报告，彩图66）、盘（图13，中；图18，右；图40，上右）、玉壶春瓶（图25，右1、右2）、灯台（2000年报告，彩图58，地层99WYA2T6L2）、盒（97年报告，插图50）等。

常见装饰图案有文官（图26，下左、下右）、山水渔舟旗帜（图12，中、右；图13，中）、山形柳树（图9，下中；97年报告，彩图20）、鹿纹（图8，中右、右）、蟠螭纹（图14、40）、团鹤（图10，右）、简笔童子（图21，右）、飞凤（图19，右）、莱菔纹（图17、18）、莲塘水禽（图50，右）、折枝花（图16，中左、中右、右）、折枝花鸟（图24，右）、排点纹（2000年报告，彩图45）、“加官进禄”（97年报告，彩图23）、“孝弟忠信”（图4）、“魁”（图23，左）、“寿”（图27，中右、右）、“福”（图4）、“旭”（97年报告，彩图188，地层95WYA2T5L2）“元”（图28，右）、“正”（图6，右）、“尚”（97年报告，彩图85）、“玉”等。

2. 高峰期（清康熙后期）

从前文对大埔碗窑典型地层的分析来看，碗窑大量的高质量瓷器，主要集中在康熙晚期，这些高质量瓷器与康熙晚期的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沉船出水景德镇瓷器面貌颇为相近。另外，从社会背景来看，由于清初福建、广东沿海郑成功等抗清武装力量的活动，加之清廷顺治十三年和顺治十八年分别颁布的《禁海令》、《迁海令》，致使大埔碗窑进入了完全停烧的间歇期。虽康熙八年新安地区已获准展界，迁民开始返回久别家园，但仍然不许渔船出海¹⁰⁸。直至康熙二十三年才全面解除海禁（1684年）¹⁰⁹。起初，展界后返回原驻地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数极为有限，直到康熙末年，新安人口、赋税才接近清初水平。由此看来，无论是从科学发掘和相关对比资料，还是从社会背景角度判断，将大埔碗窑高峰期确定在康熙后期，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该期典型遗存：**99WYA2T8、99WYA2T9**。烧造品种主要是青花，少见其他品种。该期瓷器胎体大多细白坚致、釉色青白莹润，为大埔碗窑烧造质量最高的一个时期。青花发色深浅不一有黑蓝、深蓝、灰蓝等多种色调。

¹⁰⁷ 德国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二版，刘北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63页。

¹⁰⁸ 见清康熙《新安县志》卷十一“复迁”项下。

¹⁰⁹ 1684年10月，康熙帝正式发布谕令“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急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六第一八页。

该期最为流行的是一种直口弧腹碟（图 31，下左、下右）和深腹杯（图 30，右；图 42，中左），两者应是配对使用的，主要是为适应外销所生产的茶具（图 47）。这种茶具的流行，与康熙晚期欧洲开始广为流行的饮茶风气有关¹¹⁰。此外，撇口深腹碗（图 33，右；图 35，中、右）、敞口碗（图 32，右）、四系壶（2000 年报告，彩图 49）也是此期流行器型。

此期装饰图案为碗窑最丰富的一个时期，流行庭院婴戏或持荷童子（图 30，右；图 32，中左、中右、右）、茅亭垂柳（图 33，右）、山水（图 35，中、右；图 37，右）、太极八卦（图 42，中左、中右、右）、秋叶（图 31，下左、下右）、瓶花（2000 年报告，彩图 114，地层 99WYA2T8L2）、菊花（2000 年报告，彩图 112，地层 99WYA2T8L2）、梅花（2000 年报告，图 129，地层 99WYA2T8L2）、菊蝶（2000 年报告，彩图 98，地层 99WYA2T8L2）、鹤衔书（2000 年报告，彩图 117，，地层 99WYA2T8L2）、狮子（2000 年报告，彩图 95，地层 99WYA2Y2L1）、团鹤、鲤鱼跃龙门（2000 年报告，图 5b，地层 99WYA2T9L3）、飞鸟（2000 年报告，彩图 82，地层 99WYA2T8L2）及“万”（2000 年报告，彩图 119，地层 99WYA2T8L2）、“全”、“吉”（2000 年报告，彩图 108，地层 99WYA2T9L2）、“福”（2000 年报告，图 138，地层 99WYA2T9L1）、“寿”（2000 年报告，图 139，地层 99WYA2T9L2）文字等。

3. 发展期（雍正至嘉庆）

雍正至嘉庆年间是新安县获得大发展的时期。从乾隆至嘉庆间，该县人口增加了 6 倍。人口的增加，必然带动陶瓷消费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大埔碗窑的产量激增。雍正之前大埔碗窑瓷器在香港和珠三角地区发现较少，但其后的产品在深港、珠海等地均有大量出土。1995~1996 年和 1999 年碗窑两次调查与发掘中，发现不少雍正以后的遗存，特别是雍正以后遗存最丰富的一区堆积蔚为壮观，可知此期陶瓷生产产量之巨。至今还悬挂在樊仙宫的乾隆庚戌年（1790 年）的牌匾，也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瓷业之兴盛。

该期典型遗存：**95WYA1T1、T2、T3。99WYA2T8L1、99WYA2T9L1**。此外，建于康熙末雍正初，废弃于嘉庆十五年的香港东龙佛堂门炮台出土大量大埔碗窑瓷器，为碗窑瓷器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参照¹¹¹。另一处建于嘉庆十五年（1810 年）九龙寨城，也出土不少大埔碗窑瓷器，为所出碗窑器物提供了准确的上限。

通过窑址资料和相关遗存可知，该期主要烧造品种仍以青花为主。该期瓷器胎的质感和釉面的光洁度明显较康熙时下降。青花发色以灰蓝为主，个别呈黑蓝。

该期流行一种盘心装饰“福”、“上”、“元”、“友”等文字的大盘（图 52）。99WYA2T9L2 也出一件类似“吉”字盘（图 52，左上）。马来西亚吉隆坡有此类文

¹¹⁰ 吴建雍《清前期中西茶叶贸易》，《清史研究》1998 年 3 期。1716 年至 1720 年间，西欧各国对华贸易形成的以茶叶为大宗进口商品的结构，反映了十八世纪欧亚通商的主要特点，由于这一特点，人们将这一世纪称为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

¹¹¹ TUNG LUNG FORT, A Ch'ing Dynasty Fortification on Tung Lung Island, Hong Kong, PAMELA RUMBALL ROGERS,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Occasional Paper No.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未刊稿。

物发现¹¹²。据前文的分析, 9WYA2T9L2 为康熙晚期地层, 也就是说, “吉”字类文字装饰盘的上限可至康熙晚期。不过佛堂门炮台出土的此类文字盘, 尺寸明显较大, 盘内壁的草叶纹也略有变化, 另考虑到佛堂门炮台大约创建于康熙五十八年至雍正二年, 故判断佛堂门炮台出土此类文字盘可能为雍正或稍晚的产品。此时流行的灵芝纹碗(图 38、51)、梵文碗(图 53)、过墙龙纹碗(56、57、58)均受到雍正景德镇青花同类装饰的影响。缠枝花卉“喜”字碗(图 54、55)则明显模仿乾隆、嘉庆间景德镇流行的同类制品, 因其在九龙寨遗址中才出现, 故可判断其应是嘉庆以后的产品。此时开始流行一种斜腹阔底的浅碗, 如在佛堂门炮台发现大量的简笔写意山水纹碗(图 59, 中)、川字纹碗(图 62)、重圈纹碗(图 49)。从上窑址一区采集的灵芝纹碗与川字纹碗粘接在一起的标本来看(63), 川字纹碗与灵芝纹碗流行的年代是一致的。另根据川字纹碗在九龙寨还有发现, 推断川字纹、简笔写意山水纹、重圈纹的斜腹阔底浅碗流行的年代在嘉庆前后。此期流行的菊花纹碗(图 34。2000 年报告, 彩图 2、3, 78a、地层 99WYA2T9L1), 依据其所出地层, 应是雍正时期产品。此外, 此时已出现青花印花技术, 如 95WYA1T1L6、L7、L10, 99WYA2T9L1 均出土了戳印菊花纹碗。佛堂门也发现的一片青花印花瓷器残片(图 60)。

4. 衰落期(道光至上世纪 30 年代)

道光、咸丰以后, 国势衰微, 大埔碗窑的瓷业生产也趋向衰落, 瓷器质量明显下降。至光绪末年, 因外来日用瓷价廉物美, 开始占据香港市场, 故碗窑瓷器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最终在上世纪 30 年停烧。

以咸丰三年刘起龙夫人墓出土的 7 件青花瓷碗来看(图 64)¹¹³, 此时大埔碗窑的瓷业生产已衰落不堪了。其造型简单, 工艺粗率, 几乎只见斜腹阔底的浅碗, 青花发色灰暗, 胎及釉面均呈青灰, 绘画风格也趋于简率。

此外, 与上碗窑邻近的元墩下村一间废弃的民居中, 采集到的两件“福”字盘(97 年报告彩图 208、209), 青花发色灰淡, 釉面干涩无光, 也可反映清末民国碗窑瓷器工艺的基本特征。

此期遗存发现较少, 或与下碗窑等遗存被毁有关。因未能进行正式考古发掘, 仅能从地表采集的标本了解一点情况。从发现的过墙龙碗、灵芝纹杯、川子纹蝶(97 年报告图 121~124)等少量标本来看, 此处应是清代中期以后的遗存。因上碗窑未能发现清末民国时期的遗存, 故推测此阶段的遗存可能主要集中于被毁的下碗窑一带。

(二) 窑业技术

从前文对大埔碗窑瓷器的比较研究结果看, 碗窑瓷器的装饰明显受了江西景

¹¹² Kwan, K. K. and Martin, Jean, “Introduction to the finds from Pulau Tioman”, 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 Southeast Asia Ceramic Society(West Malaysia Chapter), 1985, P133-134.

¹¹³ 利国显《深圳大鹏刘起龙将军及夫人墓出土的几件青花瓷碗》, 《深圳博物馆开馆十周年纪年文集》, 中华书局, 1998 年 9 月。文中只提到刘起龙将军墓为道光十一年, 事实上刘起龙夫人墓为咸丰三年下葬。

德镇和福建漳州地区窑场的双重影响，但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福建漳州地区，窑业技术亦是如此。

1. 二号窑的类型及年代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与大埔碗窑二号窑相近的窑炉，多发现于福建漳州地区，如福建平和县五寨乡二垅窑 Y1¹¹⁴、平和县花仔楼 Y1¹¹⁵。平和的这两座窑炉，虽保存不完整，但其残存结构、布局，与大埔碗窑二号窑最为相近（图 65、66）。

这类窑炉的共同特征是：

- （1）窑炉用砖砌成，依山而建，窑底斜坡式，窑头底，窑尾高；
- （2）窑室分多间，3-5 间或 5 间以上不等；
- （3）每间窑室横宽长短，窑室之间有隔墙，隔墙下有栅栏状通火孔；
- （4）每间窑室两侧或单侧设有窑门；
- （5）窑底铺沙。

按照熊海棠先生的分类，上述类型的窑炉属半倒焰横室斜底连房窑，也有人称之为横室阶级窑。另据熊海棠的研究，典型的横室连房窑，主要流行于明末清初，较集中分布在广东潮州和福建漳浦地区，18 世纪成为日本的主要窑型。栗建安先生也认为，横室阶级窑是漳州窑窑炉技术的代表，并指出“粤东、香港、海南等地的横室阶级窑，也是漳州窑窑炉技术传播和影响的结果。”¹¹⁶。

据碗窑发掘者介绍，二号窑未见匣钵，而且，窑底可见大量排列整齐的垫墩，有的垫墩上还粘连着裸露的瓷碗，还发现不少碎片粘连在窑底上，据此可断定该窑主要采用垫墩明火裸烧技术（图 67）。

关于二号窑的年代，从窑内堆积来看，上层是大量康熙时期的瓷片堆积，最底层为少量明末遗存。据此，可知该窑废弃时间可能在明末。

2. 一号窑的类型及年代

一号窑坡度较二号窑大；前窄后宽；窑室底部是阶梯状设计；窑底铺沙；排气孔和烟道位于后壁两侧；一号窑两侧的堆积全部为清代制品，据此推测该窑的年代为清代。类似这种阶梯状坡度较大的窑在粤东大埔县九社下窑发现一处，是一处康熙以后的窑炉，因未发掘，详细结构不明¹¹⁷。这类窑可能是清代流行的窑炉类型。

3. 明代主要采用裸烧技术

大埔碗窑明代遗存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是仅发现极少量的浅腹筒形匣钵。我们仅在 99WYA2T5L2、95WYA2T5L1、99WYA2T3L1 三处典型明代遗存中发现了个别使用匣钵的情况（图 69）。这种浅腹

¹¹⁴ 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 月。71 页，图 43。

¹¹⁵ 同注 113。34 页，图 20。

¹¹⁶ 栗建安《漳州窑的研究》，见《陈昌蔚纪念论文集》，《第四辑》，财团法人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9 年 9 月。

¹¹⁷ 杨少祥《广东大埔古瓷器生产初探》，《广东文博》1986 年第 1、2 期合刊。

筒形匣钵，可能主要用于烧制小型的瓷杯。同类型的匣钵见于漳州平和县五寨花仔楼碗窑山明末遗存（图 69，下右）¹¹⁸。由此可知，大埔碗窑此类匣钵技术的应用，应是受了漳州地区窑业技术的影响。

二是碗、盘等器物普遍采用涩圈叠烧，最上一件的内底虽无涩圈，但普遍有落渣现象。如 99WYA2T5L1 出土蟠螭纹盘（图 40，上右）、95WYA2T5L3 出土“孝悌忠信”铭碗（图 4，中），以及 99WYA2T3L2 出土“寿”字碗、99WYA2T5L2 出土莱菔纹碗、99WYA2T3L1 出土青花碗、99WYA2T5L1 出土“福”字碗、99WYA2T3L1 出土“魁”字碗、99WYA2T7L1 出土花卉纹碗（图 68）。

三是器物釉面普遍青中泛黄。

四是发现“垫座”式样的一类窑具（图 70）。关于这类窑具的使用，有学者认为是轮轴帽或加工圈足的模具¹¹⁹，但从发现与此类垫座烧结在一起的瓷碗标本来看，可以肯定其用途为明代碗窑流行的一类特殊支烧垫具。

以上现象表明，明代大埔碗窑主要采用的是裸烧技术。广东大埔县明代中后期青釉器烧造，已普遍采用裸烧技术¹²⁰，香港大埔碗窑的裸烧技术很有可能是受粤东窑场裸烧技术的影响。

4、清代匣钵技术的广泛应用

明代大埔碗窑虽已出现匣钵，但应用极为有限。至康熙后期，因匣钵的普遍应用，使瓷器烧成质量明显改善，釉色由明代普遍的灰黄色变为青白色。康熙开始流行一种高深的 M 型匣钵（图 71、73，左），外壁深于钵底，钵体整体高度较高。这种匣钵是专为碗、盘类器物叠烧而设计，可明显提高装烧量。这类匣钵与漳州窑较矮的 M 型匣钵明显不同。因这类高深的 M 型匣钵也流行于广东大埔窑¹²¹，故香港大埔碗窑此类匣钵的使用，或有可能是受了广东大埔窑的影响。这类 M 型匣钵多与康熙晚期遗存伴出，是康熙时流行的装烧窑具。康熙时期除使用 M 型匣钵外，还有钵形匣钵（图 74、75，右）。钵形匣钵中还出现一种小型弧腹瓷质匣钵（分圈足、卧足两式）（图 74），从此类匣钵所粘连瓷片来看，其主要用于康熙时期流行的精细小杯的烧制（图 75，左）。此外，康熙以后，裸烧工艺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应用于普通粗瓷的烧造。从出土标本观察，一窑瓷器中，往往精品用匣钵烧造，普通粗瓷则采用裸烧工艺（图 72）。

（三）生产方式

考察大埔碗窑创烧期的瓷器，不难发现，其造型、装饰几乎完全从漳州窑瓷器照搬而来。两者绝大多数装饰图案均十分相近，几近出自一人之手。如凤纹（图

¹¹⁸ 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57页。

¹¹⁹ 周世荣《海滨瓷都——再谈香港大埔碗窑的青花瓷》，见《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94页，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

¹²⁰ 杨少祥《广东大埔古瓷器生产初探》，《广东文博》1986年第1、2期合刊。

¹²¹ 同注119。

19)、蟠螭(图14)、婴戏(图22)、天官(图26)、“魁”(图23)、“正”(图6)、“元”(图28)、“寿”(图27)字等。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特殊现象?据笔者的考察,这应与明末中荷瓷器贸易的生产组织方式密切相关。

据1636年(崇祯九年)10月5日台湾范登伯格(Van de Burgh)给巴达维亚的信说:“按照运来桶装的样品为苏拉特、波斯和考罗满达配备的二万考其(四十万件卜)……以及根据您的指示为波斯定制一万考其的瓷器,都已经前往签订了合同,中国商人答应在1637年2、3月里交货”¹²²。

另外,钱江在《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与荷兰的瓷器贸易》一文中也提到,1642年4月,驻守台湾的荷兰人与福建商人Jousit、Tecklim两人各签订了一份订购大批瓷器的详细合同¹²³。

由上可知,在明末荷兰与中国的瓷器贸易中,已建立起非常成熟的贸易网络,瓷器生产在控制数量、选择种类款式、确定交货时间,转运分销商埠等方面都有成功的操控调配手段。正因如此,如遇较大订单,一处窑场无法完成烧造任务时,中间商便会分摊给邻近地区的其他窑场或新辟窑场烧制,这大概就是大埔碗窑装饰图案与漳州地区极为相近的原因所在。

(四) 行销市场

明代大埔碗窑瓷器,目前仅在香港马鞍山乌溪沙居住遗址¹²⁴,深圳大鹏所城¹²⁵、南头城西鸚歌山南坡脚、宝安西乡铁仔山¹²⁶,台湾澎湖风柜尾遗址有发现¹²⁷。其中以深圳的发现最为丰富。台湾澎湖风柜尾的发现仅是一个孤例。从这一情况看,大埔碗窑似乎主要是一处满足本地市场需求的窑场。但从大埔碗窑创烧的时代背景、地理位置和早期瓷器面貌来看,其受到外销刺激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台湾澎湖风柜尾的发现是一个孤例,但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中荷贸易网络中所涉及的“岛间贸易”和“港脚贸易”的国家、港口、城市一定还会发现此阶段大埔碗窑瓷器的踪迹。

雍正以后,珠三角地区发现的大埔碗窑产品显著增多,海外的发现也较为丰富。说明此时的大埔碗窑是一处以满足本地需求为主,兼具外销的窑场。从上碗窑一区雍正以后堆积如山的遗存,可以想见当时产量之巨和市场之广。本地市场,以深圳、香港、珠海的发现最为丰富,如2006年深圳大鹏所城的发掘、1984年龙岗区大鹏镇鹏城村大坑下村的刘起龙将军及夫人墓(咸丰三年)¹²⁸、2000年宝安

¹²² T. Vote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37-45

¹²³ 钱江《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与荷兰的瓷器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89年1期。

¹²⁴ 香港马鞍山乌溪沙一处居住遗址内发现一件大埔碗窑明代玉壶春瓶和一些残片,从该玉壶春出土于房屋基址之内的情况,推测该遗址应是在清除迁海令之后废弃的遗迹。

¹²⁵ 2010年,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在大鹏所城城隍庙、凤凰树发掘出土了一批明代香港大埔碗窑瓷器。

¹²⁶ 南头城西鸚歌山南坡脚、宝安西乡铁仔山发现了8件可以确认为明代的大埔碗窑产品,现藏深圳博物馆。

¹²⁷ 卢泰康《台澎地区出土十七世纪漳州窑青花瓷》,《陈昌蔚纪念论文集》第四辑,财团法人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9年。

¹²⁸ 利国显《深圳大鹏刘起龙将军及夫人墓出土的几件青花瓷碗》,《深圳博物馆开馆十周年纪念文集》,1998年9月。

区铁仔山墓地,1981年南头后海、莺歌山南坡墓葬¹²⁹,深圳赤湾左、右炮台¹³⁰等均发现不少大埔碗窑产品。香港的发现主要集中在东龙洲佛堂门炮台、九龙寨城(1810年建)¹³¹、西沙十四乡马牯缆¹³²,新界屯门小坑村也有发现¹³³。珠海方面,除陆地以外,在大万山、东澳、白沥、桂山、三角山、高栏、荷包、大蜘洲、外伶仃岛等岛屿均有发现¹³⁴。此外,蒋顺洪先生根据大埔碗窑村马世安先生的记忆,指出碗窑最大之经销地为省内之江门、广州、东莞、石龙、深圳一带。蒋先生还提到,据说,民国二十年左右,广州及石龙火车站内,车站小贩出售“碗头饭”(连碗卖给旅客),所用的碗便是碗窑的产品。外销方面,因大埔海的海湾直接与碗窑村附近的畔涌村相通,海路运输十分方便。我们已在西沙西屿1号遗物点(图57,左)、银屿3号遗物点(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东北)(图59,右)发现了大埔碗窑的踪迹,应与大埔碗窑的外销有关¹³⁵。位于中国与南海必经之路上的马来西亚雕门岛发现了典型大埔碗窑川字纹盘(图62,右下)、印花团菊纹碟、双喜纹碗、灵芝纹碗等¹³⁶。马来西亚吉隆坡发现“福”字盘,马六甲发现川字纹碗(图62,右上)¹³⁷、缠枝花卉“喜”字碗(图55,右)¹³⁸,印尼泗水发现“福”字盘。此外,个别大埔碗窑瓷器在海外的发现,则与华人的迁徙有关。如在美国发现的淘金热时代华人使用的大埔碗窑瓷器就是典型的例证(图54,下左)¹³⁹。

四 文、谢二氏传说和樊仙信仰

(一) 文、谢二氏传说

文、谢二氏从梅陇迁入大埔创建窑场之传说,来自蒋顺洪先生对碗窑马世安先生的走访。马先生据其祖辈所告,说:远在马氏等之先辈未移居碗窑之前,碗窑已开始有人在此地烧制陶瓷器,陶作有二姓人管理,一姓文,一姓谢。罗香林先生进一步认为,文、谢二氏可能早于明代,已创窑于此,相信乃从梅陇一带搬来¹⁴⁰。萧国建先生则进一步指出文、谢二氏于明万历年间从梅陇迁入¹⁴¹。

¹²⁹ 杨耀林《深圳市唐至明清墓葬调查发掘简报》,《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1994年6月。

¹³⁰ 刘均雄《深圳赤湾右炮台遗址发掘简报》,《明清海防研究论丛》第二辑 鸦片战争博物馆主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

¹³¹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九龙寨城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6期。

¹³² 《西沙十四乡马牯缆遗址2002年考古调查及抢救发掘工作报告》,未刊稿。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发掘者认为该遗址是大埔碗窑的一处分销点,但从遗址中发现的标本上明显有使用痕迹的情况来看,此处应是一普通的生活居住遗址。

¹³³ 刘茂《屯门小坑村考古调查报告》,《香港考古学会会刊》第十五卷,1999-2002。

¹³⁴ 珠海市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珠海海岛考古调查》。见《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¹³⁵ 《西沙水下考古》,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

¹³⁶ Kwan, K. K. and Martin, Jean, "Introduction to the finds from Pulau Tioman", 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 Southeast Asia Ceramic Society(West Malaysia Chapter), 1985, P133-134.

¹³⁷ Nonya ware and Kitchen Ch'ing, Ceremonial and domestic pottery of the 19th-20th centuries commonly found in Malaysia, The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West Malaysia Chap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84页。

¹³⁸ 《海外瓷珍与海底瓷都》,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图72。

¹³⁹ Export Porcelain in The North American, Charkson N. Porter, Inc./Publisher, New York.

¹⁴⁰ 蒋顺洪《香港大埔碗窑陶业浅探》,珠海书院文史研究所学会丛刊之二,1973年。7页。

文、谢二姓创窑虽为传说，但相信并非空穴来风。从目前掌握的历史背景和谱牒等资料来看，文、谢二氏创烧碗窑不但可信，而且还可能从中获取更为重要的历史信息，只不过碗窑创烧的具体时间，还需综合考古发掘资料与历史背景、谱牒资料等进行综合考量，才能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

先来看文氏。据文氏族谱记载，新界文氏之始祖天瑞公，本江西吉水人，南宋景（理）宗时，因避元侵兵祸，南迁宝安县地，于南宋末再迁入本港新界，初住于屯门，继迁屏山。至五世祖荫公（字袭子），则迁今新界大埔泰坑（今大埔泰亨村），为文氏泰亨系一世祖¹⁴²。此后，文氏的人口繁衍，家势兴旺，成为新界的五大族之一。据前文的研究结果，大埔碗窑创烧于明末崇祯年间，而此时大埔文氏家族已久居于此，故大埔碗窑创烧时文氏参与其中合情合理。

再来看谢氏。据西贡沙角尾谢姓族谱记载，最早来到香港西贡沙角尾的谢氏是明崇祯年间迁入的¹⁴³。巧合的是，从前文的研究结果来看，碗窑也创烧于崇祯年间。这似可说明崇祯年间迁入的西贡沙角尾谢姓，很有可能就是碗窑创烧者之一。而且，从目前掌握的碗窑创烧的历史背景和遗迹、遗物特征来看，创建碗窑的谢氏很可能来自福建漳州地区。理据如下：

首先，从大埔碗窑早期瓷器的造型、装饰来看，几乎完全从漳州窑瓷器照搬而来，这一情况只有能够掌控漳州窑生产技术的人士直接参与大埔碗窑的生产才可能实现；

其次，明代中后期以来的海商集团主要由漳州人组成¹⁴⁴，明末最先引来荷兰人的也是漳州人¹⁴⁵，他们最容易最先获得海外贸易的需求信息，并率先创建新的窑场；

第三，明末漳州地区有大量人口外迁，其中不少就是谢姓¹⁴⁶；

第四，熟悉海外贸易和制瓷技术的谢氏，只有依托本地望族文氏，才可能站稳脚跟，创建窑场并有所发展。

至于罗香林先生推测文、谢从梅陇一带迁来，依据的应是樊仙宫内两侧正柱所挂一对同治七年所刻楹联。联文是“绩溯鸿沟，恩流雅海，仙传梅陇，泽沛碗陶”。事实上，创作于同治七年的该联中所提“仙传梅陇”，意指樊仙信仰传自梅

¹⁴¹ 萧国健《香港新界大埔碗窑及其陶业之兴衰》，《香港考古学会会刊》，1993-97，156-160页。

¹⁴² 萧国钧 萧国健《族谱与香港地方史研究》，显朝书室出版，1982年。四十三页。

¹⁴³ 萧国健《谱牒中所见明清之际来港之客族》。见萧国钧 萧国健《族谱与香港地方史研究》，显朝书室出版，1982年。三十四页。

¹⁴⁴ 明代中后期漳州籍海商集团首领主要有谢策（又名谢和，人称谢老，漳州人）、明末漳州籍海商集团首领主要有颜思齐（字振泉，漳州府海澄人）、刘香（又称刘香老，漳州府漳浦人，一说广东省香港南丫岛人）。

¹⁴⁵ 漳州海澄人“李锦者，久驻大泥，与和兰相习。而猾商潘秀、郭震亦在大泥，与和兰贸易往还。忽一日与酋麻韦郎（应为韦麻郎）谈中华事。锦曰：‘若欲肥而囊，无以易漳者。漳故有澎湖屿在海外，可营而守也。’酋曰：‘倘守臣不允，奈何？’锦曰：‘采璫在闽，负金钱癖，若第善天之，璫特疏以闻，无不得请者，守臣安敢抗明诏哉！’酋曰：‘善。’”这位将荷兰人引到福建的李锦，即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的华商“Enp'o”。他久居马来半岛的贸易重地北大年，并曾在荷兰居住，接受过荷兰新教的洗礼而成为教徒，荷兰商人把他“当作是荷兰人而不是北大年人……。”

¹⁴⁶ 明崇祯六年，福建巡抚熊文灿与郑芝龙合议，“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连横《台湾通史》，卷1《开辟纪》），时值闽南饥荒，“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魏源《圣武记》卷8），形成闽南人有组织地向台湾移居的热潮。这时渡台的漳州人主要是龙溪、海澄、漳浦等沿海县份。漳、泉二州有不少谢姓人加入拓垦行列，成为最早入台的谢氏移民。

陇（今广东海丰梅陇墟），指的应是清初迁海之后再次开窑烧造的马氏的渊源，与文、谢二姓并无关联。

（二）樊仙信仰

论及大埔碗窑，樊仙信仰不能不谈。据游子安先生的调查，碗窑樊仙信仰应该由马氏从广东梅州五华下陶村带到香港大埔，马氏祖地五华下陶村至今还残留有樊仙宫的一道残墙和神坛基座¹⁴⁷。游先生也试图考证樊仙的由来，但他却忽略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史料。

周世荣先生在《海滨瓷都——再谈香港大埔碗窑的青花瓷》¹⁴⁸一文中曾提到民国年间文斐撰写的《醴陵瓷业考》的一段记载：“清初，广东兴宁人廖仲威，于邑之汾山发现瓷矿。雍正七年，向汾山寺僧智慧赁山采泥，创设瓷厂，并约其同乡技工陶、曾、马、廖、樊等二十余人，共同组织，招工传习，遂为醴瓷之嚆矢。”又说“其先师樊进德，明朝人，业瓷者，每开窑必祀，相沿至今，汾山有樊公庙。”因香港大埔马氏祖地五华紧邻兴宁，故此推知，《醴陵瓷业考》所提兴宁人廖仲威之先师樊进德，其实同是大埔碗窑崇奉之樊仙。

五 结语

综合以上研究，可知大埔碗窑与闽粤沿海大批仿烧景德镇青花瓷窑场一样，同是明中期以来，海外贸易对中国青花瓷需求急剧扩张背景下的产物。具体到大埔碗窑则是在中荷贸易背景下，于明崇祯年间创烧的一处窑场。其产品大致可分初创期、高峰期、发展期、衰落期四个阶段。其窑业技术受景德镇窑、漳州窑、粤东窑场的多重影响，但更直接的影响来源于福建漳州窑。其早期市场行销，除满足新安县本地需求外，极有可能还扮演着中荷贸易网络中的“岛间贸易”和“港脚贸易”角色；雍正以后，成为一处以满足珠三角地区需求为主，兼及外销的窑场。

（该项研究所涉及的香港大埔碗窑窑址资料及香港相关遗址资料，均由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提供，参考文献承香港中文大学的林业强先生大力协助，特致谢忱！该项研究报告为著者本人研究成果，不代表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的观点与立场）

¹⁴⁷ 游子安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 《行业神、庙宇与社区历史——大埔碗窑村研究》，2008年2月28日。未刊稿。

¹⁴⁸ 周世荣《海滨瓷都——再谈香港大埔碗窑的青花瓷》，见94页，《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窑址——发掘及研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0年。



图2 “崇禎拾伍年造”青花碗残底



图3 “戊寅”铭残墓志



图4 “孝悌忠信”铭碗 左：99WYA2T6L2 出土 中：95WYA2T5L3 出土 右：99WYA2T5L2 出土



图5
左：明末景德镇青花“状元及第”铭碗 私人藏
中：明末景德镇青花“金榜题名”铭碗 私人藏
右：明末漳州诏安秀篆窑“□□传礼”铭碗



→ 图6

左：漳州平和窑出土“正”字碗
右：95WYA2T5L3 出土“正”字碟





图 7

左：明末漳州秀篆窑出土缠带菊瓣纹碗 中：95WYA2T5L2 出土缠带纹碗 右：99WYA2T3L1 出土菊瓣纹碗



图 8 左：明末景德镇鹿纹盘局部 大英博物馆藏 中左：明末景德镇青花鹿纹碗局部 私人藏

中右：1995 年碗窑采集青花鹿纹碗残片 右：95WYA2T5L1 出土青花鹿纹碗



图 9

上左：99WYA2T5L1 出土白釉杯

上中：1995 年碗窑采集青花柳树渔舟图杯

上右：95WYA2T5L1 出土点彩杯

下左：1995 年碗窑采集蓝釉杯

下中：95WYA2T1L2 出土柳树渔舟图杯

下右：台南社内遗址出土青花杯

→ 图 10 团鹤纹碗

左：Hatcher 沉船打捞

右：95WYA2T5L1 出土

↓ 图 11 诗文碗

左：明末景德镇青花 私人藏

中：99A2T3L2 出土

右：99A2T5L2 出土



图 12 渔舟图碗 左：明末景德镇青花 私人藏 中：1995 年碗窑采集 右：99WYA2T5L2 出土



图 13 山水渔舟图盘

左：明末景德镇青花 私人藏 中：2001WYT2L4 出土 右：福建诏安秀篆窑出土



图 14 左：漳州华安东溪窑出土蟠螭纹碗 中左：95WYA2T5L2 出土蟠螭纹碗
中右：99WYA2T5L2 出土蟠螭纹碗 右：99WYA2T5L1 出土蟠螭纹器盖



←图 15 锦带纹碗

左：Hatcher 沉船打捞 右：99WYA2T5L2 出土



图 16 折枝花纹碗

左：Hatcher 沉船打捞 中左：99WYA2T6L2 出土 中右：99WYA2T5L1 出土 右：99WYA2T6L2 出土



图 17 莲瓣纹碗 左：明末景德镇青花 私人藏 中：99WYA2T5L1 出土 右：99WYA2T6L2 出土



←图 18 莲瓣纹碟

左：明末景德镇青花 私人藏 右：99WYA2T5L1 出土



←图 19 凤纹碗
左：Hatcher 沉船打捞
右：99WYA2T6L2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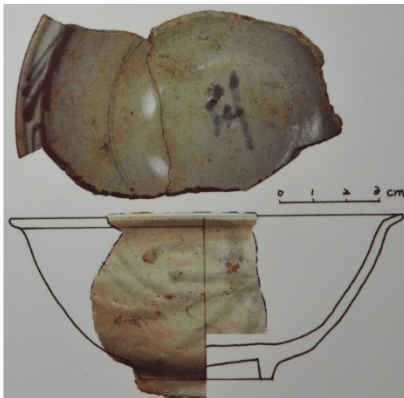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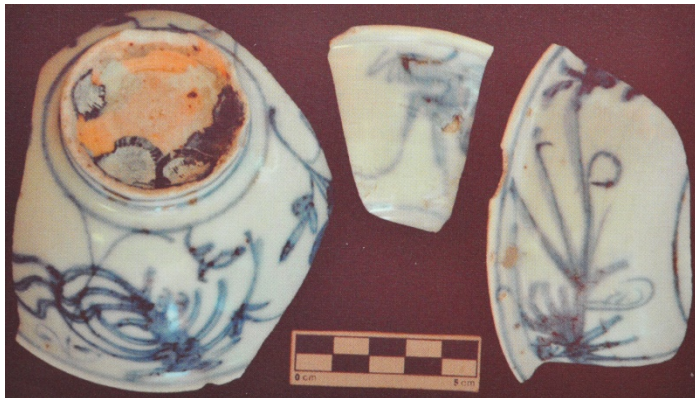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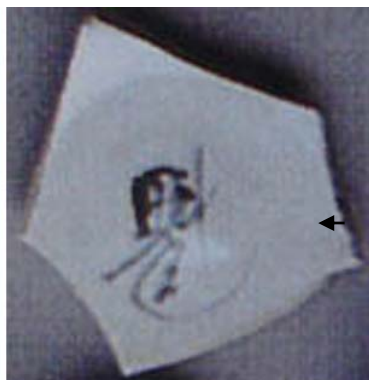
图 20 凤纹碗 左：台湾澎湖马公港出土 右：台湾台南社内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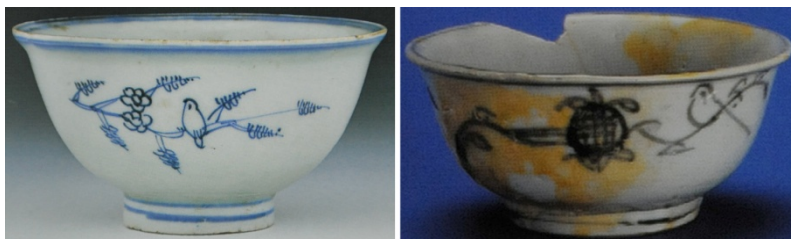
→图 21 婴戏图碗
左：台湾澎湖风柜尾出土
右：99WYA2T6L2 出土



图 22 婴戏图碗 私人藏 左：明末景德镇青花 中：漳州诏安县秀篆窑出土 右：99WYA2T6L2 出土



←图 23 “魁”字碗
左：99WYA2T6L2 出土
右：福建漳州平和窑出土



←图 24 折枝花鸟纹碗

左：明末景德镇青花 大英博物馆藏

右：99WYA2T6L2 出土



↑图 25 玉壶春瓶

左 1：台湾宜兰淇武兰出土

左 2：日本九州大有府内町砦出土

中：台湾台南社出土

右 2：99WYA2T6L2 出土

右 1：香港马鞍山乌溪沙居住遗址出土



图 26 天官碗

上左：南澳一号沉船打捞

上中：福建漳浦明崇祯十五年墓出土

上右：福建华安东溪窑出土

下左：大埔碗窑采集

下右：99WYA2T6L1 出土



图 27 寿字碗 左：明末景德镇青花 私人藏 中左：明末漳州平和
大垵窑址出土 中右：1995 年大埔碗窑采集 右：99WYA2T6L1 出土



图 28 “元”字碗

左：福建漳州诏安县秀篆窑出土

右：95WYA2T6L3 出土



图 29 青花花边纹碗

上：漳州平和南胜花仔楼出土

下：99WYA2T7L2 出土



图 30

左：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沉船打捞婴戏图碗 右：99WYA2T8L2 出土“大清年记”铭婴戏图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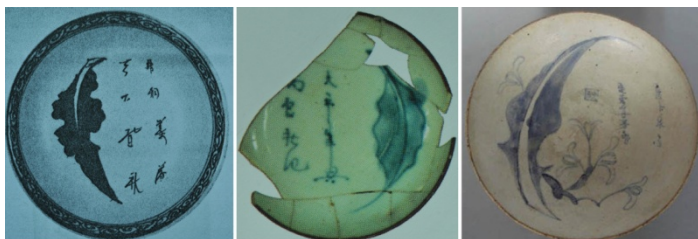


图 31

上左：“大清丁未年制”款秋叶纹盘
首都博物馆藏
上中：“丙辰秋记”秋叶纹盘
台湾台南社内出土
上右：秋叶纹盘
越南 Vung Tau 号沉船打捞
下左：99WYA2T8L2 出土秋叶纹盘
下右：99WYA2T8L2 出土秋叶纹盘



图 32

左：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沉船打捞青花
婴戏图碗
中左：99WYA2T8L2 出土婴戏图盘
中右：99WYA2T9L3 出土婴戏图瓶盖
右：99WYA2T9L2 出土婴戏图碗



图 33 茅亭垂柳图碗

左：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沉船打捞
右：99WYA2T8L2 出土



图 34 菊花纹碗

上左：越南 Ca Mau 沉船打捞
上右：99WYA2T8L1 出土
下左：95WYA1T2L6 出土
下右：95A2T4L1 出土



↑ 图 35 山水图碗

左：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沉船打捞
中：95WYA2T1L2 出土
右：99WYA2T9L3 出土



← 图 36

左：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沉船打捞寿字碗
右：99WYA2T9L2 出土寿字碟



← 图 37 山水纹碟

左：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沉船打捞
右：99WYA2T9L2 出土

→ 图 39 雍正官窑青花灵芝纹杯
北京匡时国际 2006 年拍品



↓ 图 38 灵芝纹碗

左：Tek Sing 号打捞
中：95WYA1T1L6 出土
右：99WYA2T9L1 出土



← 图 40

上左：明末景德镇蟠螭纹碗
上右：99WYA2T5L1 出土蟠螭纹盘
下左：漳州平和大垵窑址出土
下右：95 年大埔碗窑采集



↓ 图 41 深圳南头西郊出土红绿彩
鱼纹杯 深圳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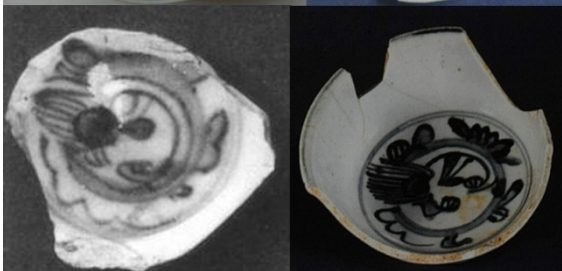




图 42 八卦太极图碗、杯 左：福建平潭康熙晚期碗礁一号沉船打捞 中左：99WYA2T8L2 出土
中右：99WYA2T6L1 出土 右：99WYA2T2L2 出土



图 43 莲花纹碟
左：99WYA2T8L2 出土 右：99WYA2T1L2 出土



图 45 蓝地白花菊花纹碗
左：99WYA2T1L2 出土 右：99WYA2T8L2 出土



图 46 团鹤纹碗
左：99WYA2T2L2 出土 右：99WYA2T8L2 出土



图 48 诗文碗 左：99WYA2T2L2 出土 右：99WYA2T8L2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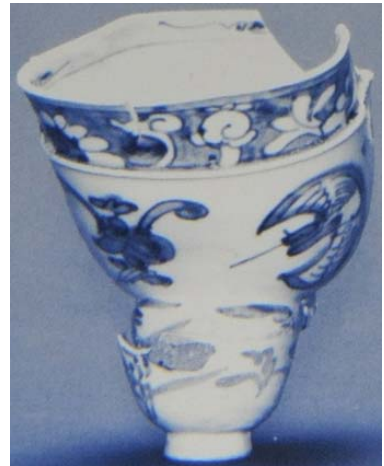


图 44 蓝地白花菊花纹碗、
团鹤纹碗、花草纹杯
99WYA2T2L2 出土



图 47 配套使用的杯盘
杯：99WYA2T8L2 出土

→ 图 49
重圈纹碗
左：95WYA1T1L11
出土
右：香港东龙佛堂
门炮台出土





← 图 50

左：明末景德镇青花水禽纹碗局部
私人藏

右：99WYA2T6L2 出土青花水禽纹碗



← 图 51 灵芝纹碗

左：Tek Sing 号打捞

右：95WYA1T1L10 出土

↓ 图 52 青花文字盘

左上：99WYA2T9L2 出土

右下：马来西亚吉隆坡发现

其余：香港东龙佛堂门炮台出土



↑ 图 53 梵文碗

左：清雍正景德镇制品 私人藏

中：1995 年碗窑采集

右：95WYA2T1L1 出土



← 图 54 缠枝花卉“喜”字碗

上左：景德镇清中期制品 私人藏

上右：2004 年碗窑龟地岗东麓采集

下左：美国淘金热时代华人使用

下右：深圳南头西郊采集



图 55 缠枝花卉“喜”字碗 左、中：香港九龙寨出土 右：马六甲出土



图 56 青花过墙龙碗 大埔碗窑采集



↑ 图 57 青花过墙龙碗
左：西沙西屿 1 号遗物点打捞 右：深圳南头清代墓葬采集

↑ 图 58 景德镇窑雍正青花
过墙龙碗 私人藏



图 59 青花山水图碗 左：99WYA2T9L2 出土 中：香港东龙佛堂门炮台出土 右：西沙银屿 3 号遗物点打捞



← 图 60
香港东龙佛堂门炮台出土
青花印花花卉纹碗残片

→ 图 61
95WYA2T1L3 出土青花山水
纹碗





图 63 上碗窑一区采集烧结一体的川字纹碗、灵芝纹碗标本



图 62 川字纹碗、盘

左上: WYA1T1L7 出土 右上: 马六甲发现

左中: 香港东龙佛堂门炮台出土

右中: 香港九龙寨出土

左下: 下碗窑采集 右下: 马来西亚雕门岛出土



图 64 咸丰三年刘起龙夫人墓出土青花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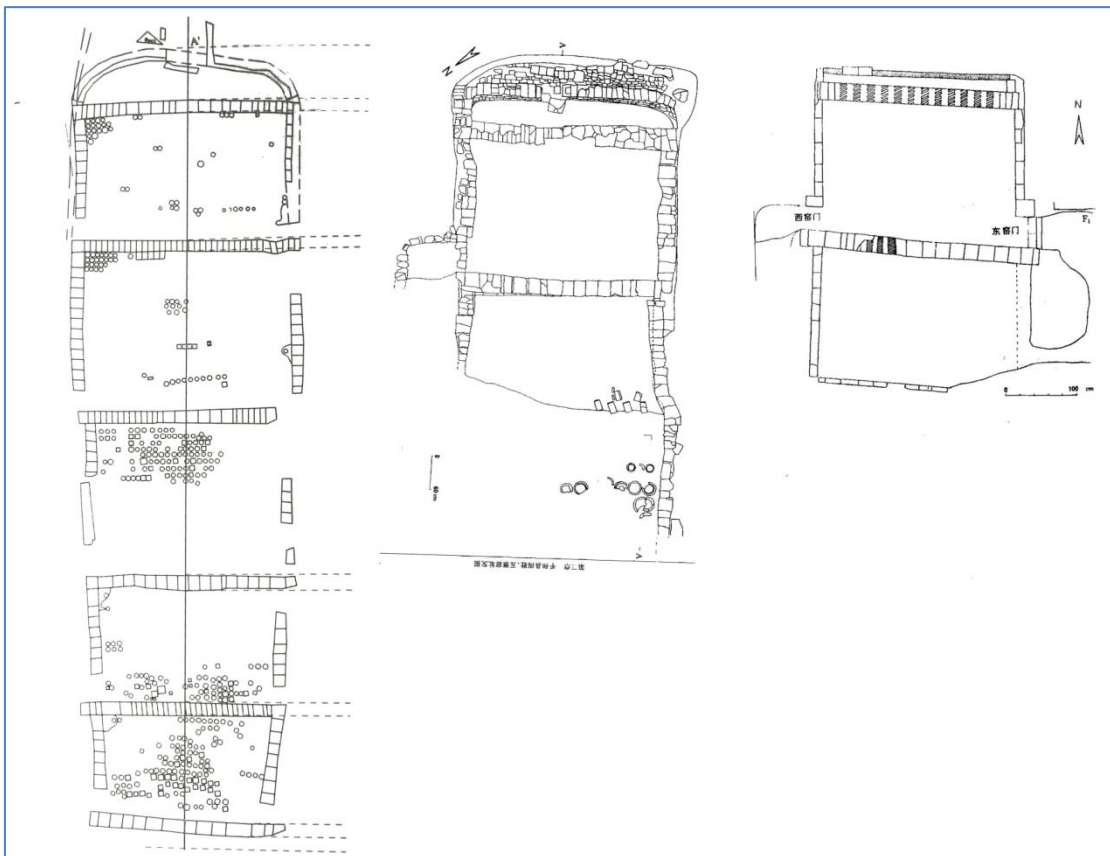


图 65 左: 上碗窑窑区二号窑炉 中: 漳州平和县五寨乡二垅窑 Y1 右: 漳州平和县花仔楼 Y1



图 66 左：上碗窑窑区二号窑炉 右上：漳州平和县五寨乡二垅窑 Y1 右下：漳州平和县花仔楼 Y1



图 67 左：二号窑炉垫墩上裸烧的瓷器



右：垫墩和裸烧瓷器烧结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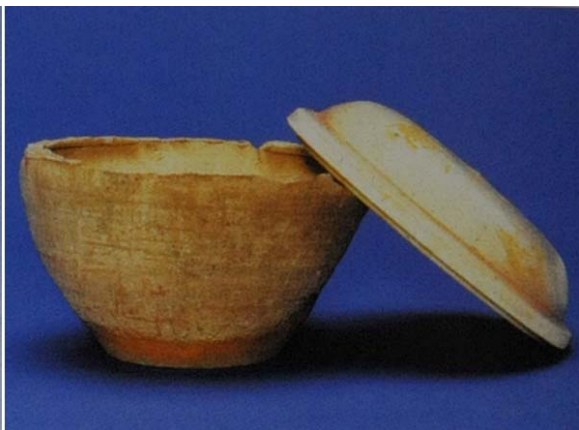


图 74 瓷胎匣钵 左：圈足钵形匣钵 99WYA2T8L2 出土 右：卧足钵形匣钵 99WYA2T8L2 出土



图 68 明代瓷器落渣标本

上左: 99WYA2T3L2 出土 上中: 99WYA2T5L2 出土 上右: 99WYA2T3L1 出土
下左: 99WYA2T5L1 出土 下中: 99WYA2T3L1 出土 下右: 99WYA2T7L1 出土



图 69 明代遗存中发现的筒形匣钵

上左: 99WYA2T5L2 出土 上中: 95WYA2T5L1 出土 上右: 99WYA2T3L1 出土

中 (正反两图): 99WYA2T6L2 出土

下左 (正反两图): 99WYA2T6L1 出土 下右: 漳州平和县五寨花仔楼碗窑山明末遗存出土



图 70 与明代瓷器伴出的窑具

左 1: 95WYA2T5L2 出土 中 1: 95WYA2T5L1 出土 右 1: 99WYA2T3L1 出土
 左 2: 99WYA2T5L2 出土 中 2: 99WYA2T5L1 出土 右 2: 95WYA2T5L1 出土
 左 3: 99WYA2T6L2 出土 中 3: 99WYA2T6L2 出土 右 3: 99WYA2T6L2 出土
 左 4: 99WYA2T6L2 出土 中 4: 99WYA2T6L1 出土 右 4: 99WYA2T6L2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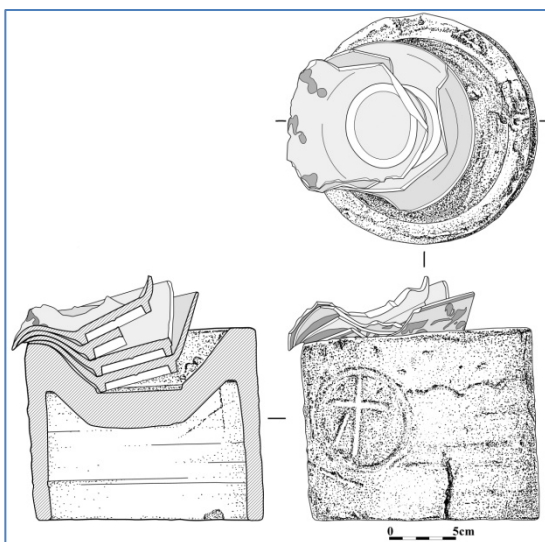


图 71 M 型匣钵示意图



图 72 匣钵与裸烧瓷器粘合标本 95WYA2T2L6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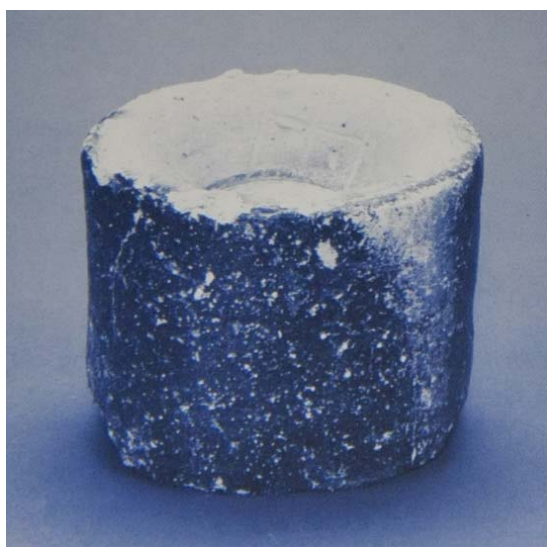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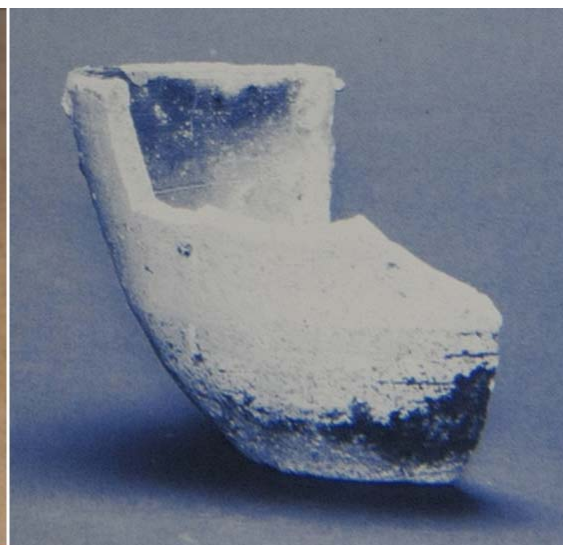
图 73 左：99WYA2T9L2 出土夹砂胎 M 型匣钵



右：碗窑采集粘连叠烧瓷碗的夹砂胎 M 形匣钵



图 75 左：瓷胎匣钵与精细小杯粘合标本 99WYA2Y2L3 出土



右：夹砂胎钵形匣钵 99WYA2T9L2 出土